

独立阅读

2007 年 12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书评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美国·休斯敦）

友情翻译：陈丹丹（南京）

编者按：

迄今为止，“独立阅读”已经推出六期。我们做到了“阅读”，但“独立”与否要交由读者来判断。“独立阅读”所期待的不仅是独立书评，还有独立读者，后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书评的作者要是独立读者，书评的读者也要是独立读者。只有两方并进，书评才有可能拥有公信力。

本期译介《猜不透的迷——我们为何阅读？》提到“恰当的书在恰当的时间可以引发终身的阅读习惯”，马慧元小姐钩沉了百年前的《读书人》——这也让“独立阅读”感到并不寂寞，虽然它未必是“恰当的书”，也有可能很快被遗忘。张昕先生引述了“沉默中的囚徒”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话：“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在我们看来，这个“正常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拥有独立阅读习惯的国家。这会不会仅仅是个“乌托邦”？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愿意努力。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远 水：政治

王晓渔：文史

书评

张 昕：“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

严 飞：华西村的整合与分化

羽 良：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

马慧元：《读书人》拾屑——百年前的文学往事

沈展云：乌托邦死了！乌托邦万岁！

话题

成 庆：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

译介

莫托克·里奇：猜不透的迷——我们为何阅读？

影像

汪 伟：论摄影（二）

来信

言 一：“独立阅读”2007年11月校勘

推荐

[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 8 月，35 元。

这本《爱与黑暗的故事》显示了奥兹同样能够“坚硬、大气和粗砺”。

[秘鲁] 巴列霍：《巴列霍诗选》，黄灿然译，华夏出版社，2007 年 10 月，14 元。

巴列霍的诗歌以及他个人的传奇故事，包括译者的水准，都是让人期待的理由。

[希腊]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中国纪行》，李成贵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 11 月，18 元。

这本薄薄的小书容纳了丰富的内容，既有一位作家的观察和描摹，也有一位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好奇。

[英] 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 年 11 月，39 元。

我相信卢斯不舍昼夜地和小男孩交谈，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

[美]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 10 月，28 元。

在布卢姆看来，民主社会对文化平等化的要求使得大学生已经无心探索心灵问题，这使得美国充斥着一股虚无主义与平庸主义的文化氛围。

[加拿大] 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新星出版社，2007 年 11 月，34 元。

这本书描述了科耶夫在当代后现代政治意识光谱的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看到了巴塔耶、福柯，甚至还有斯特劳斯的一千弟子。

[美] 谢尔兹：《逻辑与罪》，黄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 月，20 元。

在作者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琐碎语言分析，背后都指向了宗教，其哲学的根基处是一幅犹太——基督教的图景。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三联书店，2007 年 9 月，38 元。

收录了从集中营里辗转流传下来的儿童画作和诗作——这是“天真与奇迹之歌”。

[英]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朱爱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0 月，28 元。

这本 100 多年前的讲稿，比时下很多国产教材更有参考价值，100 年不动摇变成 100 年不长进，想想挺可怕的。

“重返 61 号公路”：《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新星出版社，2007 年 9 月，28 元。

作者“重返 61 号公路”（这个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歌名）从未踏足台湾，居然勾勒出台湾民歌 30 年的历程，让人感到意外。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戴新伟（广州，yukon1944@yahoo.com.cn）

8月开始，大有来头的书一茬接一茬，这些不得不以大师称呼的“大块头”们，J.M.库切、乔治·奥威尔、赫拉巴尔、阿摩司·奥兹、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列霍等等他们名下的几乎每本书都值得一读，更何况有些书早就让人期待不已。比如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作为其万千粉丝之一，我希望能重温阅读《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的愉快阅读经验，作为报纸编辑，我更希望能将赫拉巴尔自传的出版看作某种“份内之事”来报道，及时“推广”给其他“赫粉”。但《河畔小城》（万世荣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9月）确实推迟出版了，虽然版权页是9月出版，到10月初我才第一时间得知出炉了。然而当我开始读赫拉巴尔的母亲从“时间停滞的小城”——宁城——回忆她与赫拉巴尔继父在啤酒厂的生活，毫无疑问的好故事又开始了。这部书包括《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和《哈乐根的数百万》三部回忆录，头尾是以作家母亲的视角写的，中间是作家的童年自传；这部书的译者们——刘星灿、杨乐云、万世荣诸位大家乃一时之选；出版装帧设计也延续了“赫拉巴尔精品集”的品位，可以说囊括了太多人的心血，绝对值得一读。



王晓渔在论及捷克文学时曾有“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跟安徽差不多”之语，这样的强烈对照式评论同样会被赫拉巴尔所激发——比如，当你读到他身为啤酒厂经理的继父每天的生活时，会不会立刻对照中国作家1980年代的工厂小说？为什么我们所熟悉的工厂小说，在脱离了相应的时代氛围之后，就会从读者的视野中淡出？

关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厚达544页的《爱与黑暗的故事》（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8月），则完全不同于阅读赫拉巴尔的酣畅。早前读奥兹的小说《莫称之为夜晚》（包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小说），对于他故事的平凡，叙事的优雅，关注面的日常性，都让我有些失望——对于一个以色列小说家而言，应该像另一位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的《蓝山》（于海江、张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那么坚硬、大气和粗砺才对。这本《爱与黑暗的故事》显示了奥兹同样能够“坚硬、大气和粗砺”，讲述以色列移民的故事，却很难严格区分是回忆录还是小说，只能如奥兹所说，是一个故事，虽然漫长，但相当精彩。

另外一位大师，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在中国出版的小说之多，足以和奥兹相媲美，《我相信》（李易丰、张伟劼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8月）这本回忆录上半年我刚得知在台湾出版了，转眼就出了简体字版本。在这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松散回忆里，富恩特斯谈论的事物从电影文学到全球化，思路极其广阔。

因乔治·奥威尔译者之一的孙仲旭先生再三提点，我对这位英国作家有过粗浅的阅读，平心而论，《一九八四》其主题的“主题先行”性给了后世争说的热闹，但我更喜欢他的随笔、政论和书信（《奥威尔书信集》，甘险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还有他不甚被人提及的小说，像最近出版的《缅甸岁月》（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即是其中之一。对于奥威尔这位作家来讲，他在大英殖民地的生活经验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他所描摹在缅甸的无论是土著代表吴波金还是大英帝国子民的约翰·弗洛里等人物，也可以看作是他殖民地岁月的某种观照。世纪之初的殖民反思，恐怕也能结合起世纪末的后殖民（V.S.奈保尔与J.M.库切）来看——比如同样在这个月出版的库切三部小说《福》（王敬慧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内陆深处》（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和《幽暗之地》（郑云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虽然《缅甸岁月》开头并不十分好读，但作为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还是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人读下去。



秘鲁诗人巴列霍的诗选，据闻早先是列入河北教育出版社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里，后来译者发过一些篇章给我，读后有尝鼎一脔的感觉。巴列霍的诗歌以及他个人的传奇故事，包括译者的水准，都是让人期待的理由，如今这本《巴列霍

诗选》(黄灿然译, 华夏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 终于出版, 让人有大嚼之感。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出版界常见的书, 其涵盖面从严肃的学术领域到浮光掠影的见闻录都有, 看多了往往就以“某某人去国外游览了一番”来对应理解。意大利作家卡尔洛·斯戈隆曾经在他的小说中文版序言里, 将中国简化为有很多自行车的国家, 像这么有趣的人如今又多了一位——以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而为人所知的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1935 曾到过中国, 1955 年再度重游, 这位政治信仰上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作家, 《中国纪行》(李成贵译, 译林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 一书写下了他“在中国的所见和新旧中国的不同”, 见过清朝公主、胡适和掌权后的共产党高层。卡赞扎基斯原本希望将后一次旅行写成一部《20 年后》, 所记的笔记都很简略, 只是每天的活动和看法, 后来, 他夫人帮忙做的笔录也合在了一起出版(卡赞扎基斯在 1957 年去世, 这部书没有写成)。这本薄薄的小书容纳了丰富的内容, 既有一位作家的观察和描摹, 也有一位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好奇。这本书列入“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中, 还有另外两位希腊诗人的作品值得留意, 埃利蒂斯《理所当然》和塞弗里斯的诗选。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一直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是一个历史命题, 而不仅仅是当下之争。眼前两国的一些经济话题、政体模式和民生情况, 则是历史的某种延续而已。仅仅观察两国的 GDP 水平、外汇储备、产业结构等技术层面的指标, 就得出谁优谁劣, 谁消谁长, 很有可能一叶障目, 做出不必要的误判。

我相信英国人史密斯 (David Smith) 与我持类似的观点, 所以他才在《龙象之争: 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丁德良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 中开始就提到著名的李约瑟命题。只是他浅尝辄止, 忽然从第二章开始变成了一个从西方来的观光客, 类似于我们熟悉的“陈奂生”进城, 或者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被两个后发国家表面的宏大叙事所俘获, 仅仅从经济表象出发, 而不是站在历史的驿站里, 就拉出了仓促的结论。

棚户区的待遇

关于两个国家的最大相同点, 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正在向大城市涌动的穷人上面, 这正是后发国家试图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特征。无论是中国, 还是印度, 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还是加尔各答、新德里, 这些看上去鳞次栉比, 灯火辉煌的城市背后, 总是住着看上去不和谐的贫穷人群。在印度, 叫棚户区; 在中国, 则叫民工、农民工、流动人口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

如何处理这样的人群, 两个国家显得很不相同。我读到了另一本以印度为调查对象, 思索大众政治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田立年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7 月), 为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基本现实。

“我们是一些来自过去的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和来自南孟加拉的没有土地的人民。由于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土地, 甚至家园, 我们不得不来到加尔各答, 找一口饭吃和求一个容身之地。我们大多数人是日工和佣人, 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想自己盖了一个棚子。如果拆毁我们的窝棚, 从棚户区将我们赶走, 我们无处可去。”(《被治理者的政治》第三章)

这是 1998 年印度加尔各答郊区一个名叫人民福利联合会的民间自治组织写给政府和铁路主管部门的一份请愿信。该组织又名“铁道村”, 所有成员沿铁路而居, 用简陋的材料搭起低矮的窝棚, 并在窝棚外面自行组织起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 他们甚至把摊点摆上了铁路上面, 而当火车鸣叫着汽笛来临, 他们则迅速把摊点挪开, 让火车得以缓慢通过。

显然, 这样的局面让铁路运营商大伤脑筋, 采取行政手段将这些棚户区里的居民赶走, 是必然要想到的办法。想赶走这

些穷人的还有正式的加尔各答市民，2002 年，一个市民团体在加尔各答高级法院提起公共利益诉讼，要求将铁道村的所有住户赶走，因为他们污染了位于加尔各答南部的拉宾答拉湖。

有意思的是，铁道村的穷人们发出的请愿信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情，认为他们捍卫的仅仅是穷人的自由居住权利，而关于铁路运营的管理问题，可以找到另外的有建设性的办法，而不必诉诸以暴力驱赶的方式；在市民公共利益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高级法院也认为，穷人的基本生活权利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到过印度的中国人，看见他们的城市里到处充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高楼大厦旁边竟然是破烂不堪的棚户区，火车在驶进城里的时候，要为穷人减速，甚至停车，内心必然怀念起中国城市里的通衢大道来。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处理穷人居住问题的手段就简洁明快多了。

“近千平米的土坡上浓烟滚滚，一些地方仍有暗火燃烧，残破的瓦砾和烧过的家具三五成堆——在深圳宝安区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旁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民治街道 240 多名执法人员前日完成了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在将七八十名违建住户带到一边后，点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南方都市报》2007 年 09 月 02 日）

最近几年，这样的消息其实已经算不得新闻了，只是这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推出了火烧的办法，滚滚浓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北京这边也不断上演这样的故事情节。比如公安系统突然决定全市范围内检查出租屋，手续不全的外地务工人员被赶，接受不菲的罚金；某派出所田姓政委值班时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使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死。前不久，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当地民政官员谏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一命归西。

对历史的理性思考

仅仅揪住穷人问题进行思考，极有可能掉入简单的平均主义陷阱，甚至会助长平均主义暴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才提出“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这样的概念。他采取的个案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底层研究，但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一个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无端涌现的边缘性民众，Partha 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帝国模式，还是后现代的威权主义模式，无论是公民身份的模式，还是公民社会的模式，都可能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大众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特别是政治社会和民主的模式，通过踏上这条道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政治的想象将可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可能。

印度的学者持有如此价值观，并成为印度思想界的主流，并非偶然，而是经历过对自身历史的漫长反思，并最终成为一种集体视野。主张改革的总理辛格有一段著名的讲话，认为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渐渐远去，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为印度的总理，我有必要向大家说一句，英国给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响。英国在印度这片古老而闻名的土地上留下了法制观念、宪政政府、自由媒体、专业的市民服务、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实验室。”（辛格在牛津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2005 年 7 月）

经济学家梅格拉德·德塞是中印比较学的专家，他甚至认为，“英语也是英国留给印度的一大财富，英语使印度能更加有利地进入全球市场”。

事实上，正如大多数中国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印度也有人将印度的衰落归罪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掠夺。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问题，印度现代史曾经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一个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权威机构，认为英国的确使印度更加贫困了，他们的论据来自马克思。

“印度历史上曾经接二连三遭受过的内战、侵扰、革命、征服、饥荒等等，无论多么惨烈、频繁和具有摧毁性，但都没有从本质上动摇过印度。惟有英国的侵略摧毁了印度的社会，扰乱了国家的结构。英国人打碎了印度的旧社会，却没有帮助其建立一个新社会，这导致了如今印度人民的苦难和境遇，也使印度人失去了与他们古老传统和历史的联系”（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853 年 6 月 25 日）。

这样的批判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印度人比我们幸运的是，他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英国不一定就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使印度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工作。现在看来，将印



度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达斯《无限的印度：从独立时期到全球化信息时代》，66-67 页）。

我们认为，这种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正是印度人的伟大之所在。现在印度人普遍认为，当欧洲朝着工业革新的道路迈进，印度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片茫然，数世纪都没有重大的进步。印度学者拉尔很坚决地认为，除了那些民族主义圣徒之外，我在中世纪的印度找不到自发的技术革新愿望，尽管说印度的发展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压制，但事实上正是英国的庇护，才使得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革新驱动之一。

绕不开的“李约瑟之谜”

如果把拉尔的话置放在中国历史背景下思考，应该是有意義的。不过这样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猛烈的批判，并有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

但是，拉尔从技术革新着眼研究印度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存在某种类似之处。李约瑟是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中国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但之后就少有进步了。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的滴漏钟在当时非常先进，完全可以进一步发挥为机械钟，但结果却是欧洲人抢得先机，并将这种技术垄断了 300 多年。有人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技术没有迫切要求，不愿意承认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只把这些机器当成普通的玩具。火药的用途正是如此，当西方人把火药压缩成球状，形成极大破坏力的时候，中国仅仅把火药做成了鞭炮。

第二种解释认为当时中国本应该进一步发展技术时，却突然止步了。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制造了气派的“大宝船”，并远航，但目的却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显耀国威。这样的“面子工程”持续上演，最后造成了财政危机，因此政府不得不取消经费，终止船舶研究和航运研究，并禁止国人与国外进行任何贸易往来。如此，贸易禁令和技术停滞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国力的衰败。

从文化方面找原因，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径。很多学者强调，中国的“儒学”排斥科学，强调内省、感悟以及主观感受，这种文化哲学对科学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也是 17 世纪以后中国人强烈抵制西方科学精神的深层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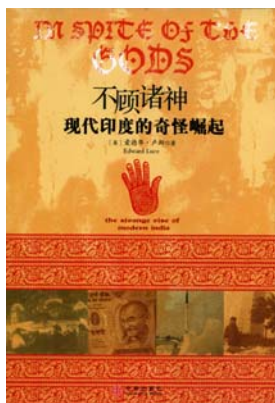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的怀疑。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几乎在几千年时间内，中国王朝统治使得民众不能发挥个人创造性，思想家的活动会被认为扰乱主流意识形态，科学家的活动会被认为破坏了祖宗律法，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认为不利于政府的有效管治。法国人艾迪安·巴拉日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不仅不允许违反和损害政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且强制灌输存在就是合理的思想。没有自由环境，也没有人提倡和支持主动精神。所有人都墨守成规，传统至上和不求上进的氛围扼杀了革新创造。”（《中华文明及其官僚体制》，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 1968 年出版，22-23 页）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李约瑟之谜”提到的诸多解释，我们今天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对此我保留谨慎的

悲观。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必然要阻碍技术的交易和提升；一个致力于大政府建设，倾向于重商主义建设的时代，必然要为政府管理的高昂成本付出代价，而开放的、透明的市场体系本来是可以节约成本的；文化的盲目自尊、观念上的假想敌思维仍然在进行，我们似乎永远陷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时代的主题；而一个没有言说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居住自由、没有选举自由的国家，它的人民怎么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

英国人卢斯显然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 年 11 月）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叙述一个年仅 10 岁的印度小男孩满脑子的问题和他不倦的怀疑。这个可爱的印度男孩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在火车上与卢斯进行智力游戏，即便这样的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别人的睡眠，也不能停止。此情此景，与中国无数的乖孩子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相信卢斯不舍昼夜地和小男孩交谈，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他有可能是未来的泰戈尔，也有



可能是下一个阿玛蒂亚·森。而那些对自由思想加以钳制的国家，它的人民，即使再过 100 年，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2005 年，台湾民歌匆匆走过了三十年岁月。在中山堂的那场“永远的未央歌”演唱会，许多昔日的民歌手多年后相逢，泪流满面，他们在那夜似乎重新寻回了民歌的精神。在那之后，民歌手们远赴华盛顿、纽约、北京，只为又一次表达台湾民歌运动的精神。而在 12 月 15 日，台湾民歌三十年纪念演唱又将在上海唱响，包括有齐豫、王海玲、李建复等老民歌手都将前来献唱，无疑让人期待。

何谓台湾民歌的精神？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有必要重新梳理出台湾民歌运动与这半个世纪变迁的历史脉络。最近市面上刚好推出了两本新书，让大陆读者能有机会了解台湾民歌的历史与其特殊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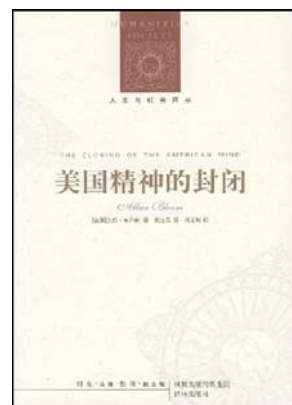
“重返 61 号公路”的《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新星出版社，2007 年 9 月）首先让人感觉奇怪的是作者的笔名，其实它是美国现代民歌关键人物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名。虽然书中内容并无太多隐闻密辛，不过要知道，大陆读者对于民歌运动的来龙去脉其实知之甚少。当初为了搞清那段对岸隐秘的民歌史，我费劲周折才托人买到张钊维的《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台湾滚石文化，2003 年），那本书虽然是学术论文体裁，但今天看来，仍然是关于民歌运动最为详备的介绍。

另外一本关于台湾民歌运动的书《地下乡愁蓝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0 月）则显得更为有趣，作者马世芳的母亲陶晓清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从小他就在自家客厅看着当年的民歌手过来过往。这本书记载着他个人的音乐记忆，同时也是台湾民歌那段欢欣路程的一个侧面，片段但却让人感触。

大陆的青年们并没有对应年代的一个“唱自己的歌”的文化运动，但是在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左右，大陆却潜伏着一条“灰皮书、黄皮书”的地下阅读史线索。沈展云的《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 年 10 月）记载了这一段他个人的阅读史，很多书名对于我而言显得十分陌生，但是我却能够体会到那一代青年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与彼岸的台湾民歌运动精神无疑有暗合之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体味。

从理想主义时代到今天的消费主义弥漫，其实不过区区 20 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只不过是一套专业化训练，已经无法承担灵魂教化的重任。一代人的精神溃败，使得理想主义难以接续。

这一点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战



亚历山大·科耶夫

后现代政治的根源

Alexandre Kojèv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 10 月）出版于 1987 年，在布卢姆看来，民主社会对文化平等化的要求使得大学生已经无心探索心灵问题，这使得美国充斥着一种虚无主义与平庸主义的文化氛围。此书当年一时间洛阳纸贵，销量高达 50 万册，可谓触碰到这个时代的美国人那根“没有文化”的敏感神经。而且也引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这本书以及背后的斯特劳斯学派的大争论。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本书曾经有过一个 1994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老译本，不过在当年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布卢姆曾被斯特劳斯送到巴黎跟随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学习，就是这个科耶夫，在法国思想界曾经散发出独特的魔力，不仅影响了象布卢姆这样的外国学生，而且就连法国本土的著名知识分子，象巴塔耶、布勒东以及拉康与雷蒙·阿隆这些人，都被他所讲授的黑格尔讲座而倾倒。巴塔耶曾如此描述科耶夫讲授的黑格尔：“科耶夫的课程将我折断、压碎、杀死了不知道多少

次。”

莎蒂亚·德鲁里的《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1月）描述了科耶夫在当代后现代政治意识光谱的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看到了巴塔耶、福柯，甚至还有斯特劳斯的一干弟子。科耶夫的那本晦涩的《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虽已翻译成中文，可是谈及者寥寥，要想读懂这本法国思想界的“秘籍”，或许还需时日。

对于哲学是什么，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在主流学界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如今成为龙头大哥，地位不可动摇。就像罗尔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也会在书中将尼采这样的人仅仅看作是“文体作家”而已，着实让人惊讶。不过好在哲学总是在竞争阐释中不断发生细微变化。象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我们习惯性将之归类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一派，不作他想。最近出版的谢尔兹(P.R. Shields)的《逻辑与罪》（黄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就是一本让人可以扭转偏见的著作，在作者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琐碎语言分析，背后都指向了宗教，其哲学的根基处是一幅犹太——基督教的图景。如此观点，新奇但也充满了风险。我也曾猜测，或许那些在细微处耐心耕耘的大家，难免都会象早期中国朴学一样，认为穷尽字意就可通晓大义，就如同兰克一样，遍搜史料只为重建一个上帝冥冥中安顿好的历史秩序而已。

古典音乐方面的出版物一直颇为冷清，三联书店的“音乐生活丛书”本算个中上品，不过出版社的领导嫌其无法赢利，不断缩减年度出版种类，造成如今偌大一个阅读市场，古典音乐方面的读物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萧条下面，偶尔也会发现几朵鲜艳的小花。马慧元的《管风琴手记》（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是作者的听乐随笔，不过主题基本上都是有关管风琴这个国人颇为陌生的巨型物件，因此阅读起来一半是弥补新知，一半也是好奇使然。要了解巴洛克时期的教堂音乐，管风琴无法绕过，这本书或许你也不要绕过。

（本文所及之作者，沈展云、马慧元均为独立阅读书评人，特此说明。）



THOUGHT&PHILOSOPHY 历史哲学

书评人 远水（广州）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因封面黑色，俗称“黑皮书”），从1985年的《人论》（卡西尔著）开始，至今已持续出版了二十多年，有五十多种。最新出版的是德国哲学家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的论文集《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0月）。韦尔默是哈贝马斯的学生，“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初看书名，以为是一本极艰涩的哲学著作；粗略翻阅，却不感到枯燥。如《理性、乌托邦与启蒙辩证法》一文，先是论述了马克思“关于未来解放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进而指出：“马克思试图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政治冲动的同时，克服乌托邦思想的无限性和任意性。然而，在试图从理论上消除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现状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之间的所有偶然性的同时，马克思事实上又被带回到乌托邦思想的语境中。”韦尔默还连带把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他称之为“进步的否定辩证法”）与“旧法兰克福学派”（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进行比较，说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引申出“现代合理化理论”）“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他预言，集权主义只能导致科层制（官僚制）的最终胜利——二十世纪的一些革命的历史至少在目前已经明确地证实了韦伯的预言”。这当然是“新法兰克福学派”（或曰“后新马克思主义”）的一家之言，左中右各派大可见仁见智。



又，关于阿伦特有两篇长文——《汉娜·阿伦特论判断：未成文的理性学说》和《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前一篇对阿伦特的三部重要著作《人的状况》、《极权主义的起源》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判断理论”进行分析，涉及对“罪恶”（阿

伦特有“绝对的恶”和“平庸的恶”之说)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商谈”的问题。韦尔默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可以被称作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的政治判断的范例……这两部重要著作确实具有实践含义”;但“悖谬性的是,阿伦特自己的行动理论的一个后果竟是,无利害旁观者的判断行动最后成了惟一真正的政治行动”。在后一篇文章中,韦尔默高度赞扬阿伦特的《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一书,说“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试图清理自由民主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此书所阐述的“政治自由观念是阿伦特最深刻的洞见和对于现代民主理论的最有成效的贡献。就此而言,她在《论革命》中激活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商谈范畴的尝试在今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一书中的其他论文,如《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民主文化的条件: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十二个提纲》、《人权与民主》、《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今意义:五个提纲》等,都可以追溯这位“新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资源。

上海三联书店的“人文经典书库”也是大规模的译丛,预告书目近百种,已出十多种,新近出版的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尼克(1862—1954)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0月)。梅尼克的名著《德国的浩劫》(中译本收进三联书店“新知文库”,何兆武译,1991年)写于1946年,其时纳粹德国已经覆灭,梅尼克亦已83岁。这位经历了俾斯麦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从德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探寻纳粹主义、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对“德国的浩劫”进行反思(详见何兆武的译序《评梅尼克及其〈德国的浩劫〉》)。《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出版于1908年,在“历史主义”的“观念史”上与《德国的浩劫》前后衔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梅尼克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及至纳粹政权崛起,他“虽然心存厌恶,却既不逃亡,也不回避自己对扩张政策的乐观态度”,对极端民族主义怀有暧昧的情感。《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由两部分论题构成(第一部分“在德意志民族国家思想发展中的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第二部分“普鲁士民族国家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全面论述了魏玛共和国之前的德国历史与文化,“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德意志文化如何形成?”此书“奠定了双重问题意识:一方面研究德意志人思想从世界主义向民族国家过渡的问题;另一方面则针对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关梅尼克的“历史主义”思想及对《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的评述,详见该书译序和“1963年版编者导论”)。梅尼克的另一部名著《历史主义的兴起》,亦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印]帕尔塔·查特吉著,范慕尤,杨曦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是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最新出版的一种。该译丛侧重于政治、思想和社会学方面的著述,近年连续出版了数十种,大多数是现代西方学术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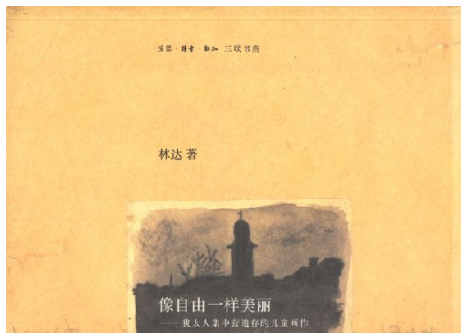
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查特吉与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和《黑皮肤,白面具》的作者)齐名,他们都关注底层民众的命运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被视为“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查特吉首先回顾了“政治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葛兰西亦进入其学术视野),然后从萨义德的《东方学》(所谓“东方主义”)引出书中的“主题和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关于“甘地与市民社会”和“尼克鲁与消极革命”是全书论述的关键所在,贫穷、疾病、压迫、不平等,战争与受难,民族主义与殖民地世界的解放斗争,抵抗与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接受和批评,完成革命并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了殖民地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幅色彩斑斓的长卷。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已经成为房地产广告，暗示着诗意是非常昂贵的。这些年，诗意已经被等同于浪漫主义，而且从朴素浪漫主义迅速“通货膨胀”为奢华浪漫主义。当年，巴尔蒙特写道：“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现在看日出也一定要飞到太平洋上的岛国。正如“浪漫”这个词一点也不浪漫，“诗意”这个词也不再有任何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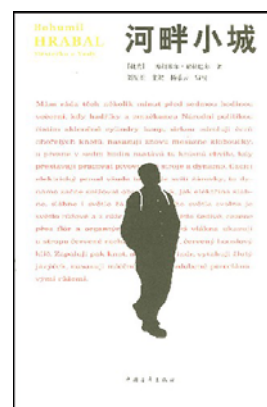
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三联书店，2007年9月），收录了从集中营里辗转流传下来的儿童画作和诗作——这是“天真与奇迹之歌”，虽然大部分孩子没有幸存，却在最后的时间里维持着自己的尊严，这是比幸存还要罕见的奇迹。叙事和抒情，是对抗集中营的不同方式，是精神的“越狱”，叙事是一种催眠，抒情则是自我唤醒。电影《美丽人生》里的父亲，把集中营描述成“迪斯尼”，让儿子在无忧无虑中度过残酷的时光。在《像自由一样美丽》里，孩子们洞悉自己的未来：“我想飞翔，可是能去哪儿，又能飞多高？/假如我也挂在枝头，既然树能开花/为什么我就不能？我不想就这样凋谢！”叙事和抒情没有身份贵贱之分：叙事是技能，需要经验，所以一般是父母给孩子讲故事；抒情是本能，所有的儿童都是天才的诗人。

读过《像自由一样美丽》，我们会对提前调谢的孩子充满无限惋惜之情，也会进一步激起对纳粹的满腔仇恨。但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是不够的。“诗意”培养的是小资，“仇恨”激发的是愤青，我们不缺少小资和愤青。极权主义如何击败魏玛共和国，纳粹如何得到德国人民的选票？这些问题更需要深思。林达在书中提到民族优越感、强权和领袖崇拜、优生运动、绝对理性等等，几乎每一点我们都似曾相识，可谓殷鉴不远。

20 世纪人才辈出的地方，除了二战时期的集中营，还有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奥威尔曾经写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李华、刘锦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他不仅注意到敌我矛盾，还注意到人民内部矛盾，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左翼和法西斯的战争，不如说是左翼内部的战争。秘鲁诗人巴列霍同样在那个时候赶赴西班牙，后来出版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死亡的场景反复在其中闪现，但是这些死亡没有被赋予某种惟一的意义，“他死去的身体包含整个世界”（《他曾经用食指在空中写……》），这让人想起卡帕那张著名的照片，当时他在西班牙，拍下了一名士兵被子弹击中仰面倒下的瞬间。黄灿然先生翻译了《聂鲁达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和《巴列霍诗选》（华夏出版社，2007年10月），前者属于在诗歌界有口皆碑的“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后者本来也应该列入这套译丛的出版计划，可是译丛搁浅，这本诗集也一直拖到今天。同时出版的还有赵振江先生翻译的《洛尔卡诗选》（华夏出版社，2007年10月），这位诗人死于西班牙内战期间。瓦列霍又译瓦叶霍，陈实先生翻译的《拉丁美洲散文诗选》（花城出版社，2007年10月），收入了他和卢本·达里奥、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的散文诗。这本书属于不太被关注的“现代散文诗名著译”，收入兰波《地狱一季》、路易·贝尔特朗《夜之卡斯帕尔》、朱尔·勒纳尔《博物志》（均为花城出版社，2004年）等。

东欧是另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经过近几年的推介，捷克作家赫拉巴尔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知。只是我不太喜欢出版社把他介绍为“生活在艰辛的社会底层，沐浴着底层生活发出的微光”，仿佛这是一位苦大愁深的作家，这种表述与赫拉巴尔的风格完全相反。与此前的小开本“赫拉巴尔精品集”相比，《河畔小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9月）改换了封面风格和开本大小，看起来很美，但是失去了连贯性，让我不知道怎么在书架上安排它们的住处。波兰学者柯拉柯夫斯基以哲学研究而著称，国内曾经出版他的不少学术著作，今年看到《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三联书店，2007年1月），才知道他经常不务正业，写点童话什么的。同时也知道他还有一本《与魔鬼的谈话》，于是期待，没想到它不声不响地由华夏出版社于2007年9月推出。这几种童话的译者是杨德友先生，他曾经翻译过《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10余种著作，在我看来，早已是“著名翻译家”，应该约稿不断。读过《与魔鬼谈话》的译后记，才知道杨德友因“右倾”被发配到山西，至今还经常为译作的去处发愁，“身在‘外地’，要想在京沪等地大出版社发表译文谈何容易”！我们常说经济的地域差别，其实文化的地理歧视更为严重，山西的煤老板跑到以排外而著称的上海，会受到售楼处小姐的夹道欢迎，可是这位“著名翻译家”到了京沪只能被当作“外地人”。

除了东欧，还有台湾。台湾文化在大陆很受欢迎，我们常常看到枝叶，却不关注他们从什么地方生长出来。不了解台湾



的历史，也难以理解台湾文化，可是不要说学院文化，就是歌手，我们也是只知道周杰伦不知道胡德夫，只知道张惠妹不知道陶晓清。《遥远的乡愁》（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为我们补了台湾民歌运动的一课。作者“重返61号公路”（这个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歌名）从未踏足台湾，居然勾勒出台湾民歌30年的历程，让人感到意外。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当她涉及到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内地民歌，却有力不从心之感，以至于把张广天当作中国现代民歌运动的重要代表。我对这本书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一些资料，而不是那些小资加愤青的观点。如果对台湾民歌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找一找“民歌嘉年华——永远的未央歌”演唱会DVD，重温那些久违的声音。

写到这里，发现集中营、西班牙、东欧、台湾，都是曾经被极权或者威权浸淫过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前仆后继地产生着诗人、小说家、童话作家、歌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需要诗。这种诗不仅表现为分行的诗歌，还可以表现为小说、童话和民歌，它们承担的责任不是反抗，而是超越压迫者和反抗者而存在，维系个人的尊严，即使极权或者威权成为历史，我们依然愿意重温这些诗。



当然，我们还需要读些其他的。《近代史讲稿》（朱爱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是阿克顿在剑桥大学的讲稿，梳理了从新世界、文艺复兴到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我最近在给学生上西方文化史，正好讲到这段时间，这本100多年前的讲稿，比时下很多国产教材更有参考价值，100年不动摇变成100年不长进，想想挺可怕的。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在十几年前就已译成中文，题目是《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谈论的是美国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可是，我们无法隔岸观火，因为这些问题几乎也同样出现在中国的校园里，热情、好奇、想象力的丧失，远离典籍。除此之外，我们还多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打小报告、应试思维、不习惯自由，更是积重难返。“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又是一位诗人，在整整20年前“预言”了未来的情形。

书评·政治与社会

“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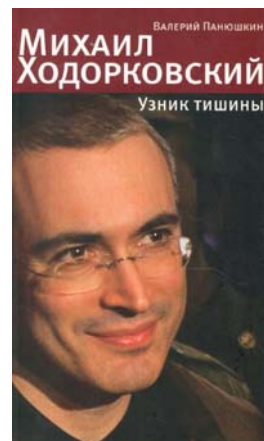
书评人 张昕（美国·洛杉矶 xinzhang999@gmail.com）

因为写论文的关系，对于俄罗斯石油公司尤科斯的前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关注已久。自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以来，俄罗斯书市上以他为题——或者就是以他的名字或照片为幌子——的书出了不少，我手头这本2006年出版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沉默中的囚徒》是其中难得的一见的严肃作品。

此书作者瓦列里·帕纽西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是俄罗斯权威报纸《生意人》（《Коммерсантъ》）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在其职业生涯中和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其商业伙伴及其家人多有直接接触。在书中，帕纽西金以追忆与现状（2003年尤科斯案件事发之后）两条线并行的方式，通过霍多尔科夫斯基个人的经历记录了一个自由派记者眼中俄罗斯过去15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作者写作的意图远不在单纯讲一个寡头个人起伏兴衰的故事。如果是那样，俄罗斯寡头里诸如别列佐夫斯基或是阿布拉莫维奇等人都有远比霍多尔科夫斯基更多足以吸引读者眼球的“猛料”可以曝光。帕纽西金真正关注的是造就、毁灭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商业奇迹的环境。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个人经历以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为分界，大致可以分成“原始积累”和“原始积累后”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帕纽西金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否背负所谓资本主义“原罪”是持否定态度的：无论是最初霍多尔科夫



斯基在苏联共青团干部的职位上开始从事商业活动、此后 1990 年代初参与私有化（尤其是在 1996 年联合其他几个大银行家和叶利钦政府之间的“债转股”交易）、还是最后针对尤科斯公司的多项逃税和商业欺诈指控。在此，帕纽西金的价值判断大致对应着大卫·休谟的政治哲学思想：在所谓财产的“初始占有”阶段，没有所谓道德概念；只有当争夺财产最初控制权的你争我夺尘埃落定之后，“权利”、“道德”之类的概念才可能在自生秩序中演变产生，只有此时我们才有可能来判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

帕纽西金没有停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人们已经熟悉的阶段。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描述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完成这个积累过程之后的转变。在 1998 年金融危机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全面改造接手的尤科斯公司：他动用自己的保安部队赶走了公司地方分支内部保持实际控制权的各种“地痞流氓”，通过非常强硬的手段实现了自己对公司的控股权（关于这一段历史，作者提供的显然是一个正面的解释——因为当年帮助霍多尔科夫斯基实现控制权的几名助手目前还面临谋杀罪名的起诉）。自 2000 年起，霍多尔科夫斯基更加大张旗鼓地聘请美国知名职业经理人加入尤科斯的管理团队，在公司内全面推行国际财会制度，尤其是主动公开公司的股权结构（尤其是他个人的持股份额），成为俄罗斯大企业中实行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透明化的典范，股市上尤科斯公司的股票也成为众人追捧的宠儿。在企业经营之外，他仿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设立了“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在俄罗斯各地资助教育和各类公益事业，并且向海外的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大量捐款。在政治上，他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支持多个反对党，积极介入联邦法律的制定过程，并且不断在公开场合呼吁俄罗斯进一步完善民主和法治制度。

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和尤科斯公司在世纪之交的变化是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没有被完全述说清楚的过程。他本人尽管也在不同场合——包括被捕前两个星期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中——明确地表示自己现在（2003 年）做事的规则和 1990 年代是大不一样了，但是并没有详细解释这种转变的由来。

坚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论的人固然可以论证：当能偷能抢的都已经偷完抢完，小偷强盗也会需要法律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然而，事实是并非所有的寡头都呈现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的转变。对于资本主义完全没有好感的人更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冲突的“积累”过程，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转变的出现无非是因为俄罗斯国内有更加强大的资本集团出现，迫使他改变自身和公司的形象来寻找国际资本的合作以抵御来自更强悍对手的威胁。可是尤科斯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远早于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逃税问题的调查。

帕纽西金笔下所暗示的则是另一个可能——尽管这个可能未必具有普遍性——霍多尔科夫斯基对于产权保护、良好公司治理、甚至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奔走呼吁和倾囊相助远远超越了个人层面的经济利益。这个曾经的俄罗斯首富的的确确厌倦了生活在一个这样混乱的国家。他的动机可能非常简单，就是那句帕纽西金在书中多次引用的话：“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和那些选择移居海外的寡头不同，他没有选择离开；和那些在政治压力下选择妥协的寡头不同，他相信——或许是过于自信了——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象改造尤科斯那样改造这个国家。

帕纽西金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怜惜在书中清晰可见。他虽然没有使用这样的词语，但是在他对入狱之后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描述背后时时浮现的是一个“殉道者”的影子。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霍多尔科夫斯基选择皈依东正教，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不断反省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失败教训，并且开始勾画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图景。而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派，帕纽西金在书中多处描述了俄罗斯媒体在金融危机之前那个政治上最自由的时代如何“自宫”式地违背了自己的道德操守，委身于金钱利诱，成为各大寡头或者利益集团操纵用以相互打击的工具。对此痛心疾首的帕纽西金应该是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两者都在反思自由主义何以在俄罗斯失败。帕纽西金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怜惜是因为后者自我反省的勇气：这个狱中失去行动自由的囚徒在思想上却表现得前所未有的活跃和深刻，他甚至开始反省在俄罗斯有可能迈向“正常国家”的关键时刻自己没有尽到作为一个自由派应尽的责任。所以帕纽西金会在书中长篇摘录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狱中写的多封长信，包括那两篇著名的长文《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向左转》。让帕纽西金尤其痛惜的是，当初霍多尔科夫斯基选择让尤科斯走向透明的管理结构、在大众面前开始自我反省，恰恰方便了日后别人对他定罪。相形之下，那位在俄罗斯被视为窃国大盗、目前在伦敦整日吵嚷着要资助革命推翻普京政权的别列佐夫斯基倒是找到了指责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把柄：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要做软骨头，有什么好忏悔的？看看你忏悔之后的下场！

帕纽西金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位“沉默中的囚徒”的同情，他表示“霍多尔科夫斯基可能是有罪的，但这不是他现在入狱的原因。”帕纽西金在成书之后的访谈中直言自己写这样的书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客观”，并且告诫那些此前对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无所知的读者，不要指望读了这本书会对后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帕纽西金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能够在 9 年刑期结束之后如期出狱深表怀疑：因为他当初不是依“法”入狱，因此以后也很难依“法”出狱。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今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开始酝酿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合作伙伴提出新的起诉。

文章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到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官方网站看了看。网站上显示，如果我们相信莫斯科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的话，离这个沉默中的囚徒结束在西伯利亚赤塔监狱的刑期，还有 1451 天 4 小时 52 分钟。

而俄罗斯过渡到霍多尔科夫斯基希望生活的那个“正常国家”还要多久？

Валерий Панюшкин (2006) *Михаил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узник тишин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Секрет фирмы»

瓦列里·帕纽西金：《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沉默中的囚徒》，《公司机密》出版社，莫斯科，2006。

华西村的整合与分化

书评人 严飞（香港，fei.yan@green.oxon.org）

对中国乡村进行系统性、学术性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最早发端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其后，内地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都秉承这种“乡土调查”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对中国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农村集体进行了大量真实而又富有成效的调查工作，比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陈桂棣与吴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最新的，就是这本九访江苏华西中心村，在深入调查 414 户人家 1681 人基础上写就的《中国第一村》。

华西村地处江苏无锡，在全国早已久负盛名。上世纪 60 年代，它是“学大寨”的典型；70 年代末，举国皆谈包产分田的时候，它却坚持走集体主义；80 年代，它又成为发展乡镇企业和扶贫的样板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它再次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被推广和宣传。自 1961 年建村发展至今，华西村已经由原来的纯农业小区自发转变为一个没有一分耕地、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却拥有 8 大公司 86 个企业、上万打工者的城镇工业小区。当年建村时，集体资产只有 2.5 万元，年人均分配收入仅 53 元，到 2005 年这一数字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全村经济产值跃至 307.9 亿元，年人均分配收入更是升达 6.5 万元。这种经济增长的奇迹，除了为华西村带来“中国第一村”的美誉外，也同时让所有人都惊叹和好奇于其转型背后所承载的内在推动力：在 40 多年的风雨变化中，华西村是如何成功的从农业化走向工业化，又是如何在全国农村响应包产到户的“小岗模式”下，坚守一条集体主义的文化道路？

对此，作者将这种内力诠释为“后集体主义”（post-collectivism），以区别于 1978 年改革之前的农村集体主义，以及 1978 年后出现的新集体主义。所谓“后集体主义”，是指在社会变迁中延续形成的一种“对人民公社时代集体主义的继承、消解和再造的整合体，既受传统农业、计划再分配体制的影响，又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结果”。这一概念被具体建构于华西村的实际经验上而言，后集体主义首先是一种小区形态，是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社会主义转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共同产物；其次，后集体主义是一种社会结构，是在小区分化、异质和多元性格基础之上，依然追求并努力维护集体主义原则的高度整合社会。华西村所奉行的这种后集体主义村庄发展原则，不仅体现在村庄资产份额、领导和管理权等结构性要素上，比如确立了以老书记吴仁宝为权力核心的乡村家族秩序，而且作为一种纯粹的道理力量根深蒂固于村庄的习惯和各项规章制度之中，左右着村庄干部和普通村民的日常行为。

围绕着“后集体主义”这一叙事脉络，作者在理论框架层面上运用社会类型整合理论和市场转型整合理论，并辅理性选择理论，层次分明地分析了华西村不断自我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转型轨迹和道路。社会类型理论起源于 19 世纪末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以社会学家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为代表，是直接关注于社会结构整合的宏观理论；市场转型理论催生于 1978 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直接关注于转型经济中产权分化、权力分化和利益分化的中观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多地强调行动者的理性选择，是关注价值理性（追求社会主义集体富裕的精神理念）如何与工具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理念）权衡的微观理论。



从 1961 年到 2003 年之间，华西村完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转型：一是从农业小区转向工业小区，二是从计划经济转行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分化和整合必然成为各种矛盾和权力相互交葛和纠缠的主体。在市场化、私有化、去集体化的大背景之中，华西村之所以可以做到持之以恒地维持村落人口主体、政治权威人物、集体所有制这三个基本要素不变，必然是“集体共同体整合的力量战胜使个体可能发生离散的村庄分化力量”的结果。

在这其中，作者详细分析了华西村集体与个体、整合与分化博弈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当全国兴起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潮时，华西村自发抵制了农业改革中的包产分田，主动选定发展集体工业生产，由此成功迈出了村庄经历的第一级整合：工业整合；第二阶段，因发展工业而经济富足之后的华西村，开始出现组织结构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危机，为了平衡村集团、部门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华西村经历了村庄的第二级整合：利益整合，人为制造了外来打工者、村民、一般村干部和村权威领导者的社会阶级划分，以保证村庄小区共同体的整合；第三阶段，当地位身份和经济关系的分层出现，就预示着不同阶层之间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等文化分化的危机。历来将精神归属的统一视为重上之重的华西村，通过制定事无巨细、奖惩明确的村规民约，约束并维护了村民对集体的忠诚，并由此构建出村庄的第三级整合：制度整合；第四阶段，当带有专制集权性质的体制难以维系所有成员共同拥有某种同样的意识形态时，再一次分化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在面对迅速被私有化、全球化的外部陌生世界时，村庄成员在不自觉中需要寻找值得信赖的庇护所。正是如此，传统的家族政治开始成为华西村的支柱，并同时力排市场不确定、系统整合失序等因素对集体的干扰，将集体政权逐渐转入亲属能人的手中，并建立起村庄的第四级整合：权威产权整合。

作者在此注意到，一次次在华西村上演的整合战胜分化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乡土社会所独有的家族政治道路。费孝通最早用“差序格局”描绘了这种社会结构，并借助同心圆波纹作比喻，将之形象地描述为“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头投水般和别人发生联系的社会关系，会似水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由近推远，愈推愈薄”。他把中国人的精神理念设想成一组同心圆：圆心是自我，外圈是亲朋和家庭关系，再外面是企业组织，最外圈是社会。通过从外圈社会到核心自我的层层解剖，从而构建出一个以己、以家再以社会（或小区）、国家层层拓开的社会网络结构。

尽管华西村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费孝通所描绘的同心圆差序格局却一直持续存在：这就是“以吴仁宝为中心，从血亲、姻亲、自然村、本村、周边村再到外来打工者的层层控制、层层关乎的村庄泛家族控制秩序”。构建华西村家族政治道路的吴仁宝，历经 42 年风雨，非但没有一天失去权威，反而带领华西村创造出中国“首富村”的神话。而作为神话主角的他，在实现“权（power）”向“威（authority）”合法过渡的同时，也依靠自己的领袖魅力权威，成功实现了“行政共同体（家族组织）”、“村落共同体（村规民约）”以及“利益共同体（阶层结构）”的三大权威整合。

2003 年 7 月，华西村政权实现亲子交接，当时 76 岁的吴仁宝将“一把手”的令牌传递给他的四儿子 39 岁的吴协恩。华西村的故事，又该在时代的变迁潮流中如何演绎呢？华西村究竟是“一个历史的过客”抑或是“一个永久的例外”呢？作者提出这个疑问，并将此留给时间做解答。

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 年 4 月。

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

书评人 羽良（北京，Preistliu@gmail.com）

不久去世的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消费社会理论：消费社会造成了一个虚假的观念，人们认为个人有大量选择的机会。但实际上，人们却陷入现实规定的限制中不能自拔。

波德里亚的这一理论，被深受他学说影响的好莱坞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现在应该是姐弟了）几乎原封不动的搬到了《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在《黑客帝国》第一部中，墨菲斯对尼奥的一段对白可以为证：“真相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来受奴役……你给关在一所监狱里，这监狱你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这是你头脑的监狱。”这差不多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是说，人们只是自以为可以进行难以计数的选择，但实际上，早在进行选择之前，人们已经被这些难以计数而且不断被繁衍创造的选择对象所奴役了。

这几乎是所有步入所谓“消费社会”的社会没法回避的根本困境。这一困境诱发了像波德里亚这样的学者探究“消费社会”本质的兴趣，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刚刚局部走出消费贫乏，步入消费加大丰富不久的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后知后觉当是情有可原。庆幸的是，在中国，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了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郑也夫先生于今年出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以下简称《后物欲》）便是其中一例。

尽管郑也夫并不太认同波德里亚晦涩的理论表达，而更青睐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但他还是在波德里亚的启发下，得出了“19世纪驯化出工人，20世纪驯化出消费者”的看法。在郑也夫看来，消费社会是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为满足人类自身的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发展出的必然产物。这三项需求按照郑先生通俗的表述，分别是：舒适、牛逼和刺激。

按照郑也夫的解释，舒适满足的是人类面对饥饿而渴求温饱的需要；牛逼则是人类作为动物进行性炫耀的本能；刺激，则是在温饱和随时随地的生存安全感得到解决之后，对随之而来的空虚和无聊的反应。人类社会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历史，在本质上便是围绕着这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展开的。

当人类的物质生产历史进入工业时代后，消费社会呈现出的绝大部分后现代问题便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因为工业时代的特征：大规模、同质化、低成本的复制，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人类对舒适的需求。然而，随之而来的，出于炫耀心理的“牛逼需求”和温饱之后的存在主义困惑“找什么刺激”的问题却越来越显著的成为人类生活的焦虑。消费社会，本质上就成为通过不断扩大、不断翻新的消费，来满足人们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缓解对这两者的焦虑的手段。

但在郑先生看来，通过不断消费来解除焦虑的消费带给人类社会的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因为，只要本质还是在通过翻新产品来满足炫耀和寻求刺激的需求，那么人的自我实现就永远被一种往复不断的拜物循环所压抑。以至于对牛逼和刺激的焦虑在根本上是无从解决的。这与墨菲斯所说的“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的“头脑的监狱”，与波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的虚假观念”，如出一辙。

独辟蹊径的是，郑也夫认为“游戏”可以代替“无休止的过度消费”来满足人们在获得舒适后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因为“游戏”是一个过程，它没有打算逃离人类社会的生产和进步，但却解除了靠“消费物质”来满足牛逼和刺激需求时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压抑。让人在“游戏”中实现自我，也在“游戏”中实现社会，更在“游戏”中解除根本需求的焦虑。这的确是郑也夫先生在《后物欲》一书中的极大创见。

不过，也许郑先生过分关注了“消费社会”消极的一面，却可能有意无意间略过了“消费”本身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民众惯于将选择权交给权威的国家。

比如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便可一窥“消费”的积极一面。曾几何时，流行音乐对中国人而言就是八出革命样板戏。而文革之后，李谷一受到批判的《乡恋》，邓丽君《小城故事》的靡靡之音，乃至张明敏当年极为流行化的《我的中国心》，在丰富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品同时，更是启发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可以说，正是基于娱乐消费的流行音乐，伴随着政治领域的真理大讨论，在八十年代初期荡涤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极权意识形态残余。而且，仅仅十年时间，中国人的娱乐消费就从李谷一和邓丽君式的传统美声唱法，亟不可待的升级到崔健和罗大佑的摇滚乐。

当崔健将裤脚卷的一高一低，在工人体育场以近似于狂吼的方式演唱《一无所有》的时候，亿万中国人心地积压已久的情绪，也在刹那间以娱乐消费的方式释放出来。到了1989年，当全世界的记者跑到北京意欲采访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新闻时，却惊愕的收获了天安门广场上更大的新闻。而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会放过这条新闻中的一个细节：广场上四处飘荡的侯德建和罗大佑的歌曲。对流行音乐的娱乐消费，成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中无可忽视的一部分。

又过了16年，中国人在似乎毫无新意的消费着各式各样流行音乐的时候，突然被“超级女声”短信投票这样一种全新的娱乐消费方式所大面积感染。以至于一夜之间，在这么一个缺乏结社和选举自由的国家里，人们因为疯狂的超女消费而成立了无数的“玉米俱乐部”、“凉粉俱乐部”，为了“超女”，一贯被视为缺乏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好像无师自通的理解了投票的权利和花样繁多的投票策略，甚至有人喊出了“老子这辈子投不出一个国家主席，但一定要投出一个女娃子”的豪言壮语。一场轰轰烈烈的市民文化运动，以消费的名义，颠覆着看似强大无比的威权统治。

可以说，消费见证了中国人自主意识的逐步唤醒。从消费流行音乐去争取完整的政治权利，到消费住房去争取完整的财产权利，再到消费麦当劳去拓展沟通空间消费。在不经意间，消费与中国社会的巨变已经牢牢的捆绑在一起。笔者并非借此否定郑也夫先生对“消费社会”批判意见，上述对消费积极意义的说明也只是想补充一下郑先生的结论。因为笔者看来，在

中国这样一个诸多方面还处在前现代的国家里，消费社会应对的未必只是空虚和无聊，因为我们离后现代尚远。

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月。

书评·文学

《读书人》拾屑——百年前的文学往事

书评人 马慧元（美国·休斯敦，huiyuanma@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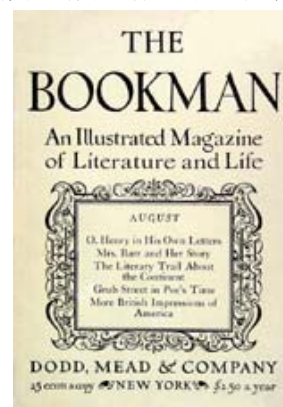
1895 年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那是中国的“清光绪二十一年”。跟中国有关的历史事件包括：甲午战争结束和公车上书运动。总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苦难史中的普通一年。而大洋这边的美国，虽然分享着这个世界上的喧嚣、混乱和野蛮，但在文学和艺术上仍硕果累累，尤其是出版业空前繁荣，留下了许多著名文学刊物。插图文学杂志《读书人》（Bookman—An Illustrated Magazine of Literature and Life）即在这一年创刊。虽然这家杂志已于 1933 年被《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1933-37）取代，但如今在许多图书馆都可见到完整的合订本。当年它的定价是每期 25 分，全年两美元。如今既然绝版，买其中一卷至少需 170 美元左右。

我常常穿行在图书馆那个孤寂的区域翻读这排旧刊。一排排装上硬皮的合订本纸页发黄然而图画精美，温暖可喜，不过那斯文书香的背景，竟然是故土生灵涂炭并且被异族掠夺的岁月。不仅如此，那时的美利坚对华裔仍然心狠手辣，不知我的先人们，有多少能够安然在图书馆展卷读书。人世荒诞，大抵如此。

彼时罪恶且不论，能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样的地方保留并且光大了文化薪火，总是好的。当然，时局悬隔，今人只闻书香，而书这物什，想躲本国政治是躲不开的——它不去麻烦政治，自有政治来麻烦它。《读书人》虽以正统文学评论和创作为己任，但 1927 年的继任主编柯林斯倾向右翼，刊物风格渐变。后人说，自他以来，《读书人》辉煌不再。而这位柯林斯大人，后来勇于赞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终于臭名昭著。

文学杂志总归不是留存政治理念的理想工具。今人读它，妙趣在于回顾文学艺术史上的浪潮和话语权更迭以及真实的文化氛围。随手翻来，书中的作家照片、书籍和画展广告、畅销书榜、礼品书和儿童书推荐，都是有体温的历史——也就是所谓世态炎凉。纷乱世界一如既往，而那个时代的美国读书人趣味让人羡慕。《读书人》促成（约稿）了很多重要的文学评论，不少文集都由此成型。不仅如此，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每一卷，都有许多今天大家记得的名字。随手拾屑数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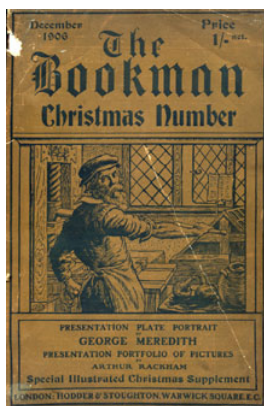
1896 年中一期，刊登美国文学评论家川特（W. Trent）的《作为历史小说家的马克吐温》。那时马克·吐温还在世，川特在文中称呼他的原名——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看来克莱门斯先生当年竟然大力投入历史小说创作，川特说他很有野心，但所作中只有《琐忆圣女贞德》还像部历史小说，并且在当时慢慢流行起来。然而，Trent 委婉但坚决地表示，克莱门斯先生的写作没有说服力，哪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试图创造一个马塞克式的形象……他打算表达得既简单又富有色彩……然而他失败了。”“他对贞德的赞美，结果就是使主人公失去了人情味和生气。”马克·吐温在当时主要被当作幽默作家，所以立志写“伟大的”历史小说，走进大师的队伍。“了解自己从来不是克莱门斯先生的长处。”川特这样说。

随手翻开一本 1906 年的合订本。其中两篇文章有关托尔斯泰。我在学校里一个挂满作家照片的地方见过托老晚年的照片，曾经大吃一惊，原来胡须老长，瘦，背着破包，似乎破衣烂衫，乞丐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意外。此人经历了奢侈和放荡，突然找到理由让自己换了种活法，晚年专心研究宗教。看上去，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真的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追求信仰，用身用心一起求。

这时(1906 年)，托老还有四年可活。

这两篇说托老的文章，作者是毛德(Maude)夫妇——托尔斯泰的英语译者。

一篇题为《托尔斯泰在 1906》，作者是妻子路易丝。可以看出，路易丝·Maude 作为托老的忠实读者，细心地感知和珍惜跟托老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对谈话中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比如一个乞丐的出现等等，都很留意托老的反应。虽然俄国之旅本身算是走马观花，但以往的阅读经验不时涌上来，让她激动不已。她对托老说，许多读者都喜欢你写的东西，说从中得到很多指点，还有个素食联合会要我转达对你的感谢，因为你帮他们坚持素食。托老显得惊讶并且高兴——他说，“但是，不知道那些人喜欢读我，赞同我，为什么还吃肉？”原来托老晚年入教，食素。“他们非说素食比肉食还贵，连妻子都不支持我，故意买来不入季的蔬菜，证明素食更贵！”



另一篇，毛德先生的《最后一次访问托尔斯泰》，更有实质内容。这篇文章后来被很多人引用，大概形成美国人对托老的主要印象。

托尔斯泰对作者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是写给“寻求快感，但不打算借此（该小说）改变和发展对生活的看法”的读者的。而《复活》就很明显地要形成真正的“看法”，并且影响读者。他总是赞扬别人的写作，比如对狄更斯，但对高尔基评价很低，认为他被文学界高估了。当时很多人模仿高尔基，托老说，这些人叙事简直跟给小孩子讲故事一样，只会用大灰狼吓唬人。

说到爱，托尔斯泰说，上帝就是爱。我们不能为之增加什么，也根本不该企图增加。正好那个周日，一个陌生的犹太神职人员来访，这种人是托老最重视的客人。托老邀他共读《新约》和《塔木德》，读到兴头，一节一节地向大家朗读其中的诗篇。

文章的结尾写道：访问结束的时刻，已经是月夜。乡下的景色很美，我趁着好心情，来到一片树林，那里能听见回声。我哼起一支好听的民歌，歌词是自己的，“我——爱——你——”。坐火车回莫斯科，车不准时，车上拥挤、不快活、空气不好。这一程，好象专为结束跟托尔斯泰在一起的经历——让你感受一下，他对现代文明的愤恨。

英语世界对俄苏文学向来不敢小觑，我在任何大学图书馆网页上一敲托尔斯泰，又会蹦出一百多本相关的书。

《读书人》有个专栏之一是每月书评或者剧评，数量不等，有多少荐多少。比如 1906 年这卷，有一篇评论传记《王尔德的一生》，认为作者歇洛德 (Sherard) 是王尔德生前好友，出于友情才费力写传，不然的话，谁肯给他写五百多页的传记！尤其是他的不光彩一生，还是让世人忘却为妙。现在读来，简直是典型的话语权更迭下的幽默。如今王尔德早坐稳了英语文学的主流位置，而且给他写的传记，早满坑满谷了，他同性恋的臭事，成了绝佳的噱头，谁敢因为道德观念把这纨绔子弟拒之门外？而那传记写道，王尔德当初读的是牛津，一个学术优秀、趣味高雅然而道德败坏的地方。如果他不肯去牛津就好了，他会成为一个完美守法的绅士的……

另外一篇荐的是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自传《我的童年和少年》。作者很有眼光地指出，勃兰兑斯写自传，既有客观的自我观察，又有个人化的体味，这正是那个写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勃兰兑斯。他生长于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尤其聪明而充满理性。“对我来说，妈妈是世上最难取悦的人。每当眼光不够高的人对我过分夸奖，妈妈总是迅速地矫正我的自矜……多年以后，有人问我，母亲老了，你是否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说，感谢上帝，妈妈总算开始赞扬我们了。”勃兰兑斯的六卷大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写作横跨作者的半辈子，其间作者的想法变动发展很大。而如今这部欧洲文学批评的必读书，作者当初压根没有当真正的批评来写，目的只是为“封闭狭隘的丹麦人”启蒙，普及欧洲主流文化。除此之外，别无野心。然而在出版的过程中，勃兰兑斯一直被同胞批评“媚外”、“不爱国”，因为他一心推崇德国英国文学和知识界精英。

1918 年，一战尾声。刊物中依然充满平静和认真。倒不是人们躲进象牙塔粉饰太平，而是看上去他们的确若无其事地生活、读书、采访作家。这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去世的年头，书中有篇介绍和悼念他的长文。而跟战争有关的栏目只有一个，叫做战争回音，算是战势评述，其他的文章，基本没有战争气息，仍然风雅温情得紧。有个固定栏目叫做“事件和评论”，某期头条：现在在打仗，出书是不是奢侈？把出书的钱省下来，是不是对国家更有益？此刻出版界似乎比较繁荣，仗在打，各种闲书潮水一样照出不误。从栏目上看到的回答是，书仍然要出，而且还要多出，因为数量是质量的保证，什么样的审查制度也不能保证只出好书不出烂书！

这一本里，有一位学者菲尔普斯 (William Lyon Phelps) 连载长文，《美国二十世纪诗歌的探险》。其中第八篇说到女诗人洛威尔 (Amy Lowell)。

洛威尔小时候，全家出行欧洲，长大后她又独自旅行几次，去过土耳其和希腊。也许是为旅行中的感受打动，加上阅读的影响（尤其是济慈），她决心把自己献给诗歌。然后，她开始了八年默默的学习和练习，八年里没有发表一个字。

真是勇敢坚定的人。她快四十岁才出版第一本诗集。两年后又出一本，这时声誉鹊起，而且一直为新诗，尤其是自由诗不懈斗争。关于她的名诗《图案》(Patterns)，菲尔普斯这样说，“我喜欢它，出于很多原因。这首诗那么真实、亲切，因为它叙述的是一种悲剧体验，这种体验在普通的生活中时时发生，其悲剧感被矛盾所加强：阳光照耀下的花园那么光辉、明亮、清爽，而路上灵魂的旅程那么灰暗；被扰的心灵在和谐的节奏中跳动，伴随花朵随风的轻舞。这样的气氛在一个句子中被转化到死寂之中，灵魂和肉体突然面对掠夺与丧失。合上这首诗，好象看到了生活的动荡。这些日子终将到来：水仙变成玫瑰，变成草，变成雪——但孤独和荒凉的图案不变。”诗中的 Pattern 本来指花园小路的图案，但后来扩大并纳入“战争”的图景。这里的灿烂景物步步追随心境，好象舞台上的聚光灯。所以有人说洛威尔擅于给无生命的物体“吹入”呼吸。

关于几位当代和传统诗人，作者总结道，田纳西的诗给人以慵懒松弛的抚慰，爱默生、堂恩、布朗宁几位的诗是灵魂的利剑，对抗纯粹美感。而洛威尔用音乐刺激人，扰动多于宽慰。

文章发表时(1918 年)，洛威尔还活着，所以本文作者给了她一些建议：不要介意什么新诗理论，不要攻击也不要捍卫任何东西，写就是了。真正的诗不管披着什么外套也能被认出来。这些琐事让记者们去闹。洛威尔的处女作不算好，但从第二本，《剑锋和罂粟籽》开始，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她强调三点：向伟大的诗艺致敬；不拘于任何流派；以诚实的态度和艰苦的劳动学习写诗。菲尔普斯说，她对颜色和声音的敏感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叙事传统。在叙事方面，当代只有约翰·曼斯菲尔德可与她相比。

1915—1917 年，美国出了本小书，叫做《六位意象派诗人集》(Six Imagists)，这六人既非敌人也非密友，大家在游戏规则下友好竞争。六人中最好的就是洛威尔。除此之外，她写过专门论述济慈的书。济慈出版《哈迪密恩》的时候，自己知道其中有无穷缺点，而且很难修正。他还是要将其出版以求忘却，以后再写更好的东西。

限于篇幅，本文仅摘取早期《读书人》杂志中的片段。窃以为期刊是重现世界的马赛克之一，虽然未免含有人造颜色——比如折射着时局背景。文学期刊目击名作取得话语权的历程，也忠实记载了被历史遗忘的衮衮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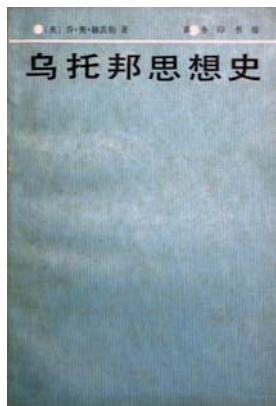
书评·思想

乌托邦死了！乌托邦万岁！

书评人 沈展云（广州）

大同之梦激励人心

在纪元前十一至四世纪的以色列历史中，出现了几位“希伯来先知者”，他们以独创的精神和“著述”，“提出重建社会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虽然他们更多地侧重于伦理—宗教性思想方面的阐述，有论者仍称之为“乌托邦思想家的先驱”（[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作为“社会设计师”，希伯来先知者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比柏拉图（公元前 437—347 年）还要早，但一般认为，哲人政治家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才是第一个“乌托邦共和国”的完整“计划纲要”。尽管对柏拉图的评价毁誉参半，然而其思想震古烁今，启迪后世，是毋庸置疑的。故赫茨勒将以色列的先知者与柏拉图等量齐观，说他们“如果不是高于柏拉图的话，至少也可以和他媲美”。



生活在纪元前八世纪中期的阿莫斯，是以色列先知者中的先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了“理想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似江水滔滔。”自希伯来先知者及柏拉图之后，乌托邦思想和著述不绝如缕。十六世纪初，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这是乌托邦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莫尔虚拟了一个完善、和谐、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叫做“乌托邦”的理想国，从此，乌托邦(Utopia)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同义词。莫尔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霍布斯的《利维坦》，哈林顿的

《大洋国》，乃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无不受其影响和启发，所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说：“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

人类社会迭经巨变，屡遭重创；白云苍狗，惟大同之梦永远激励人心，永远不会幻灭。公平、正义、思想自由，以及对权力的制约，是人类共同体赖以建构的基本要素，无奈“美丽新世界”以底于成，谈何容易！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乌托邦”的社会实践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乌托邦彼岸”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围绕着“革命—国家—乌托邦”的政治实践和对未来社会蓝图的构想，在第二国际各派之间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论战（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几部相关的重要文献——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十月革命前夕，1918年出版）、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并上溯至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后由恩格斯发表于1891年），当大致了解那段风雷激荡岁月的“乌托邦运动”对后世的影响。

1917年4月，流亡国外多年的列宁返回俄国策动革命。这时候的俄国，是历史上空前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时期，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俄独裁政权已经倒台，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亦风雨飘摇。列宁满怀必胜的信心，“他不用担心宗教法庭的威胁，他也不能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控制机器那么单纯；但他一路勇往直前走向彼得格勒，他知道他成功的几率远远超过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的前夕，他手上握着开启人类另一历史新页的钥匙。现在，列宁要开启的这扇大门，所展现的前景如果与他所期待的样子不符合，他随时准备改弦易辙，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不相信先知判断的人”（[美]艾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几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随即陷入内战。就像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巴枯宁曾经说过的：“旧道德已经消亡，新的还在形成中，他们被卡在中间了。”这艘叫“列宁号”的巨轮，按照一份“国家与革命”的航行指南，刚刚启程驶向“乌托邦彼岸”，而船长列宁未及看到他的理想的实现，于1924年1月21日病逝。在列宁身后，那些“大副”、“二副”们——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为夺取船长的职位展开了殊死斗争，斯大林以党同伐异，杀戮和流放肃清了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森然柄政；自此，“列宁号”易名为“斯大林号”，斯大林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与“乌托邦”

纳粹主义也想构建其“乌托邦”，希特勒也曾向德意志民族许诺一个充满各种诱惑的“理想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失地赔款，被迫接受极其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希特勒的崛起，首先是成功地利用了民众中普遍怨恨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台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最初是以“革命党”的面目出现的；它反对资本主义，支持工人运动，承诺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众同盟”，颇有一番励精图治、创造美丽新世界的宏伟抱负。当时纳粹党的一些激烈主张和行动，如要求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剥夺资本家和犹太人的财产等，得到广大底层无产者（很多德国共产党人）的支持。

1933年1月30日，魏玛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纳粹党攫取政权。纳粹党这样一个独裁政党，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日耳曼种族优秀论，宣扬“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和精神的代表，它的上台竟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有1700万德国人投票支持希特勒“合法执政”，包括一部分德共党员），确是发人深思的。3月，纳粹党建立宣传部，旨在全面控制言论；7月，纳粹党颁布《反组建新政党法令》，宣告一党专制国家的诞生，纳粹党为唯一合法的政党。执政后的纳粹党，的确在修复战争创伤、解决人民就业、振兴国家经济、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卓有成效，使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力及国际威望大增，为世人所瞩目。纳粹党特别重视青少年教育，明确提出“谁控制了青年，谁就控制了未来”，规定年满14岁就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为纳粹乌托邦帝国而奋斗。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社会主义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在宣布党代会胜利召开之后，主持人代表全体党员向希特勒发表了坚决效忠于他的颂词：“我们的元首，我们党的领袖，您是胜利的保证。当其他人放弃时，是您坚定地坚持下来；当其他人妥协时，是您拒绝卑躬屈膝；当其他人失去信心时，是您给予他们勇气；当其他人离开我们时，是您高举着大旗领导我们前进，直到这面旗帜成为民族的大旗，胜利的象征。我们向惟一的领袖致敬！您代表着民族的未来。……德国的伟大复兴已经实现了！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英明领导下，新的一步从这里迈起，最终走向成功。让法西斯主义遍及全世界！希特勒万岁！”希特勒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致以谢词，他许诺

为德国人民创造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下，德意志大国崛起的梦想即将实现；他强调“从今天开始，在党的政治教育下，全国人民都要成为一个对党忠诚的人，只有一种想法，一个愿望，一种表达方式”。著名女导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里芬施塔尔为这次党代会拍摄了长达一个多小时、题为《信仰的胜利》的大型纪录片。《信仰的胜利》以启示录般的史诗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纳粹党的权力美学、暴力哲学，以及在党的号召下空前高涨的集体英雄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在国社党代表大会期间，希特勒检阅了军队。阅兵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元首显示自己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常用手段，它表明无论军队抑或群众，无时无刻都在他的严密控制之下；军队和人民都必须效忠于元首和纳粹党，而非忠于国家。像所有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一样，希特勒孜孜不倦地教育他的臣民要学会绝对服从。纳粹主义的未来是以精神奴役、消灭异族、征服世界为前提的，纳粹版的“乌托邦”把德国人民推向深渊，第三帝国的罪恶历史，以杀戮和侵略始，以毁灭终。

希特勒、斯大林以及那些后来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要建立的是绝对一致的极权主义社会，否则，就不会有大多数人民支持他们或参与其革命行动。他们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目标是激荡人心的，他们最初描绘的蓝图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宣称，他们要摧毁的是腐朽、垂死的旧制度，然后建设一个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地上天国；这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实在的、即将到来的美丽新世界。

革命不是原罪，乌托邦更不是原罪，但被专制权力扭曲了的“乌托邦”，被别有用心的“革命”领袖引入歧途的“乌托邦”，肯定会一步一步走向“罪”，这已被二十世纪的许多暴力革命——特别是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暴力革命——所证实。斯大林主义对构建“意识形态乌托邦”的一大“贡献”，乃在整齐思想，钳制言论，锻炼文狱，剿杀异端；俾万众忠心，上下同调，举国和谐，懿欤盛哉！及后，东欧等“兄弟国家”均以“老大哥”为模范，沿此路径直往“意识形态乌托邦”狂奔。詎料海市蜃楼瞬间幻灭，乌托邦大厦忽刺刺倒于顷刻。

“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乌托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印证了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雷蒙·阿隆、伯林等思想家对“苏式乌托邦”的预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一条走向失败之路。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和伯林的《自由四论》等著作中，都对以革命的名义推行暴力政治的“整体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由于这些思想家不相信有“地上天国”，反对以先验的“历史决定论”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作出统一而强制性的规划；主张政治自由，用民主的手段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波普尔说，“民主政治是一种避免极权暴政的有效手段”，民主社会“非常不完善，需要改良，但仍不失为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因此之故，他们遭到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的猛烈抨击，背上了“反乌托邦主义”的恶名。

1936年，波普尔作了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演讲。其基本论点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到哪里去，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这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由此，波普尔提出了“渐进的社会工程”和“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这两个对立的概念——

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可以是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所说，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个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渐进的方法与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是：渐进主义者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社会和人）是可能的和必然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他们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在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联盟中，最有力的因素无疑在于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而只是关心“整体社会”的发展。



于是，为了防范“可能隐藏着酿成意外变化的危险力量”，整体主义对社会进行全面而严厉的控制，实行中央集权。他们用官方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来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的思想自由不相容。那些力图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强行纳入某种固定的“主义”或“理想”的历史决定论，都会被历史所“证伪”，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由于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可以预测的，他们要完全控制历史，就必然沦为极端的唯意志论者，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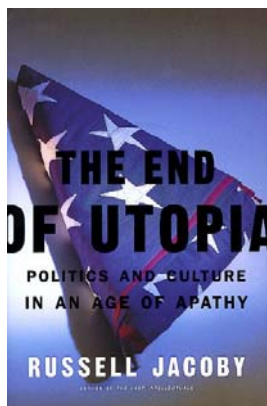
波普尔说：在各种政治思想中，要使人完美无缺和绝对幸福的想法恐怕是最危险的一种了。要在大地上建立天堂总是毫无例外地造成了地狱。

两种乌托邦主义

有感于乌托邦理想在后冷战时代受到普遍的怀疑，美国政治学者雅各比出版了《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一书。雅各比把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思想大致分成两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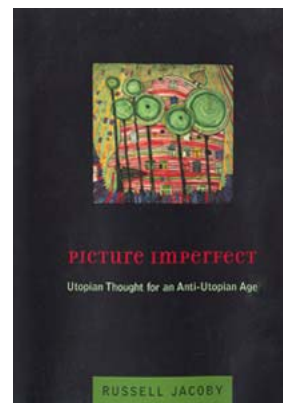
“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他提醒人们要区别乌托邦思想的这两种倾向。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精确地规划人类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经过严格规划和规范的“乌托邦”社会中，规定人们如何行动，如何思想；“蓝图派”有一种“权力主义的倾向”，人的行为受到“偶像”的统一支配，丧失了对自由的愿望和生活的多样化。“这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往往规定：乌托邦的居民应该什么时候醒来，他们该穿什么，午饭该吃多长时间。当自由受到限制时，自由本身也将衰落。我认为，这种‘蓝图’传统已经寿终正寝了。”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则“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规，拒绝将未来具体化”，“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具体东西，他们既不讲述关于明天的故事，也不提供有关明天的图画”；“尽管这些人梦想着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但是他们拒绝为其给出精确的尺寸”；“它是反偶像崇拜的，它竭力避免描绘蓝图”。雅各比所说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波普尔所指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两者没有多大分别。

雅各比承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但他认为，进行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的纳粹主义与经典的乌托邦主题无涉，而斯大林主义也因其“残暴得露骨”的特性与乌托邦理想毫无共同之处。雅各比说，一些“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如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出于“对广泛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怀有“反乌托邦敌意”；他们“将乌托邦理想、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缝合到一起”，说“乌托邦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这是雅各比不能同意的——“就他们的批判适合极权主义或它们的变体而言，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雅各比认为，二十世纪所发生的许多大屠杀，大多与种族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暴力冲突有关，“其中哪里有乌托邦主义者的踪影？”他质问：“我们能够说乌托邦主义者要为这些巨大的牺牲负责吗？我们能够说大规模的死亡主要是疯狂的或者健全的乌托邦主义者造成的吗？”



这里需要指出，在牵涉到极权主义—乌托邦主义与大屠杀的问题上，雅各比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根据雅各比所引用的一本著作《20 世纪死亡纪录》及相关数据，“20 世纪人为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有一亿”。其中，沦为纳粹牺牲品的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斯大林主义历次大清洗的，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二百万人；某些国家死于历次镇压和暴力斗争的超过五百万人。波尔布特为了建立其“纯粹的乌托邦社会”，在柬埔寨取消货币和经济交易，剥夺所有私产，废除家庭，并使用暴力将数百万城市居民（包括老弱病残者）强行驱赶到农村过集中营式的“乌托邦生活”（统一行动，统一分配生活用品，统一服装，实行公共食堂制，夫妻隔离居住、按组织上的“计划”和安排过性生活）；波尔布特独裁政权（红色高棉）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1975—1979），但被屠杀或因饥荒、奴役、迫害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二百万，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雅各比不得不承认，“这些死亡者中有一小部分，大约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可以勉强归因于乌托邦主义者”。雅各比一方面否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变体的“乌托邦主义”，但另一方面已然默认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些大屠杀确实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

在此书第二章“论反乌托邦思想”的主要部分，雅各比对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的“反乌托邦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驳。雅各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种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共识逐渐形成”。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



敌人》(1945)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 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1)、科恩的《追寻千禧年》(1957)等著作和伯林从五十年代开始写的《自由四论》中的若干篇论文,都论述了“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并将“乌托邦思想”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发展出来的极权主义理论,总是强调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波普尔从柏拉图开始,科恩从中世纪开始,塔尔蒙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开始,阿伦特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补充,“提供了关于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的证据”,他们“批判谴责乌托邦主义是历史的灾难之源”。

雅各比说,波普尔频繁地使用“乌托邦主义和历史主义(按:即历史决定论)达成一致”这样的表述,指责历史决定论者(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拒斥论证他们的“乌托邦计划”,为了实现其目的,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使用暴力。雅各比反对波普尔等人将暴力与乌托邦主义者等同起来,他说:“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群众暴力同乌托邦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

雅各比认为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的立论是有问题的:“当阿伦特试图归纳极权主义的原动力时,却将目标瞄准了‘意识形态’,即乌托邦的‘堂兄弟’。意识形态充当了她分析极权主义的关键,而且‘意识形态’之于阿伦特,就像‘历史主义’之于波普尔那样,是一种有逻辑的、封闭的体系,它假定了历史的规律,而且还导致了大屠杀。”雅各比还有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他认为希特勒纳粹主义不是极权主义,而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阿伦特所写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只适用于斯大林主义”。

阿伦特把意识形态和国家恐怖的史无前例的结合称为“绝对的恶”,把直接参与杀害大批犹太人的纳粹战犯艾希曼的罪行称为“平庸的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雅各比认为阿伦特极权主义理论的支柱是“弯曲”的,他同意一些学者的批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绝对的恶”的概念与其关于“平庸的恶”的观念相矛盾。

塔尔蒙说,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独裁统治同斯大林主义者在镇压方面有相似性,“这种相似之处似乎表明某种深不可测但又不可避免的规律的存在,这一规律使革命性的救世计划逐渐发展成恐怖统治,致使完美的直接民主的承诺在现实中却采取了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形式”;乌托邦主义“没有走向自由”,却反而“带来了极权主义的高压”。雅各比认为塔尔蒙“在术语方面附和了波普尔”,颇不以为然。

雅各比慨叹:“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一种威胁。公众的意见和学者们博学的看法都将乌托邦观念同暴力以及独裁统治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将 20 世纪的暴力主要归咎于乌托邦主义者,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不幸的是,这种归属已经变成了从波普尔直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种持久传统。这些反乌托邦主义者使用了一种模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差别的极权主义观念,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而且也将‘历史主义’、‘积极的自由’和‘意识形态’贴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就这种批判对斯大林的独裁所进行的探讨而言,它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探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杀人的民族主义、致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派系主义——这些主义不断地引发的流血事件。”

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准确地说,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究竟有没有干系呢?我以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合辙之处,都是“历史决定论”者。与“传统蓝图派”有所区别的是,极权主义是一种“变体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

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伯林们在质疑“蓝图派乌托邦”——“整体主义乌托邦”时容或有偏颇乃至矫枉过正之处,但他们指出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殊途同归,假乌托邦之名而行极权主义之实,无论在理论上抑或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他们并非如雅各比所言,完全否定乌托邦理想;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同雅各比一样,他们反对的只是“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而雅各比则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猛烈抨击,他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指责他们将各种极权主义一窝煮,把乌托邦主义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雅各比在论驳时采取实用主义手法,断章取义,对被批评者的主要观点和完整思想缺少客观的分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未免以偏概全,胜之不武。

诚然,我们不能因为极权主义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联而否定乌托邦理想;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革命与暴力有关联而否定正义的革命行动。我同意雅各比的观点:“脚踏实地的改革或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思想并行不悖,而且前者常常得益于后者的滋养。”乌托邦理想与正义的革命永远是一种召唤,激励着被奴役的人民去扫除扼杀自由和民主的独裁制度;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压迫、贫困、不平等、不自由,乌托邦理想和革命就不会消亡。



虽然雅各比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批评不无偏激之处，但他捍卫乌托邦、讴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或许，“完美的社会只是一种虚构的理想，人类的完美境界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的；唯一可能的只是努力向前而已。”（《乌托邦思想史》）雅各比提出的警告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航行中没有指南针。”

话题

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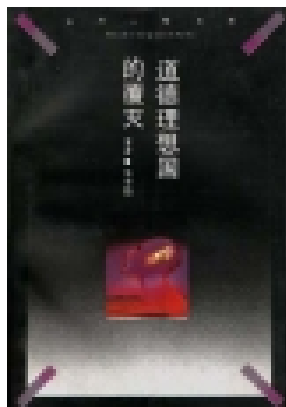
时间不过 20 余年，但是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今天却被各种声音烘托成一个既近且远的“文化符号”。在那个年代成名的许多文化人，在这一波回忆的浪潮中纷纷走向前台，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八十年代”，尽管我了解，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忆其实充满了多歧性，但是在公共空间中弥漫的更多只是惆怅与惋惜的情绪，八十年代本身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反而失之阙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对于那代人，而且对于许多后来的年轻人而言，八十年代的故事在今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检讨这样的问题，才有可能让八十年代的回忆不至于只是作为历史叙事与我们擦肩而过，进而从那些八十年代的经历中提炼出对我们有资借鉴的部分。

作为 70 年代末生人，笔者赶上了 80 年代文化热的末班车，懵懂中体验到当时的年轻人对于社会问题的热情，也借由《中国走进死胡同》、《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年 6 月）等等这样的读物开始感受到一种模糊的危机意识。这样一种精神启蒙是通过当时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的强烈影响而辐射出去的，这也使得身处西南偏僻小城的我，也能感受其力量所在。

这样一种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直接的论述，不过 1990 年代开始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讨论，我们却可以发现，1992 年之后分化的人文知识分子，所赖以反抗市场化的精神资源，似乎可用“人文精神”与“理想主义”来作总结。尽管相关讨论也曾经纷闹一时，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从讨论中了解到，维系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理想主义”，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实际上，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十余年时间就已土崩瓦解，这也让当年深受启蒙氛围打动的后辈人产生一个莫大的疑问，八十年代人所依赖的精神资源，或许本身就不够牢靠，使得一旦面对时势变化，便溃不成军。当然也有人强调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那样一种横空出世的精神氛围，本是历史的巧合，因而也只能怀念与追思。



对于我个人而言，当然无法满足这样的回答。我所感兴趣的，是在这些八十年代回忆中表达的一个中心词汇，那就是“理想主义”。这样一个词语的出现，或许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当代中国思潮演变的关键问题。回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语境中，那就是，在革命理想主义消退与八十年代浪漫主义的溃败之后，我们到底要如何使自己不被工具理性完全主宰，而保存一些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来作反思与批判。尽管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已经被朱学勤等学者当作一种全面压制性的力量作出了反思与检讨，甚至与卢梭等欧洲激进思想的脉络联系起来批判。但是现实却是，如果一个人还对公共思想议题保存兴趣，试图投入生命去从事这一项志业，难免会要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构成了你能够利用“思想”对社会的主流意见进行反思的资源。

首先或许需要理性分析的能力与相关知识的背景，但是仅仅具备这两条，并不足以让一个人进行反思性的活动。思想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给这种实践提供了个人某种生命的意义感，这也是八十年代精神氛围中最清楚的内容。“思想”在那个情境下之所以被如此关注，最主要的内容或许是给经受过意义溃败过程的知识群体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这种以自由作为目标的思想氛围，本质上是浪漫主义式的。它最为核心的观念是，



自由不仅是一种存在状态，而且还是道德化的，这就使得这个时候的“理想主义”不仅是一种冲出牢笼的冲动与激情，而且由于对某种先前的“集体伪道德”的反动，从而让个人的自由也具备了伦理内涵。

这或许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那样一种情境下，这么多知识分子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思想”这个词语本身就具备了批判的所有正当性，因此当他们在 90 年代反思市场化时，总会不由自主的预设了市场的不道德性。

事实上，对于“理想主义”的不同态度，也分化出 1990 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的复杂光谱，如果从西方思想的接受背景来看，今天仍然存在着强烈的“英美”与“德国”传统的区分，前者相信个人在市场社会中按照利益逻辑行动，基本上是一种功利论的取向，而后者却以德国精神传统作为立论的资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受工具理性所主导，是要去发现现代世界里人的生存意义的复杂性。

为什么会有如此鲜明的“英德之争”？这样一种内在的冲突，其实远非仅仅是今天思想界所面对的问题，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勱就认为，他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哲学则是德国的，但是今天为何却成泾渭分明的两条传统？如果从西方思想史的背景来看，德国在 18 世纪末期的文化“狂飙运动”实际上也是对英法发展起来的启蒙思想主流作抗争的结果，如果说英国传统所代表的启蒙思想，从怀疑宇宙秩序出发，进而不再利用外在秩序规定个人的精神秩序，进而发展出一套机械论式的主体观；德国的启蒙传统则是从另外一个取向来认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将精神作为统一个体与世界的关键，政治价值与个人的道德意义并无法分离。

如果再从“理想主义”说起，所谓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它的内涵基本上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与热情。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同样是一个重塑自我的过程，它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脱离了集体主义之后，我们该如何认识自我，并且如何借这样一种自我来说明整个意义秩序。但是这样一种追求“自由”的理想主义，最后难免没办法应对 1990 年代经济转型后的利益逻辑，也就是说，八十年代整合的“自由”概念逐渐分化成社会、政治与道德等不同领域里分化的逻辑，这也使得“理想主义”在 90 年代以后无法形成有效的论述，因为它在八十年代所依赖的浪漫主义式的激情已经无法再维系一个世俗世界的挑战，这也使得后来者面对 1980 年代与 1990 年代之间的落差常常无所适从。

进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思想界，在应对政治、道德以及社会秩序的危机时，往往习惯用一种新的整合性的一元秩序来解决这样一个全面的危机，无论是康有为的实理公法还是大同论，还是梁启超的有机国家论，他们的潜意识里都期待着存在一种一元的意义秩序，我们可以借此安排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命意义。这样一种冲动在八十年代爆发出以个性解放、追求自由为特征的启蒙思潮，而个人本身就成为所有意义的来源，但是个人主体性作为意义来源的提供者是相当不稳定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发现，激情迅速颓败，理想主义也因而无以为继，这并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某些突发事件所完全决定，而是这样一种思想的逻辑使然。

因此在重新检讨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之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碰巧在那样一个时代情境里浮现，在思想史的脉络上与晚清以来的思想变迁有关，碰巧在八十年代最终迸发，试图依靠个人本身来陈述一套完整的意义秩序，个人不仅是自由的，而且还是道德的，政治、社会领域的议题也可借此来设定和安排。但是市场化的改革所带来的是对个人的一次重要考验，它让我们迅速明白，依靠个人的激情与自由意志并无法有效抵御现代社会里的某些逻辑。2000 年以后逐渐兴起的保守主义（古典政治哲学、国学热）其实都说明了，我们曾经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场激情的行为实践，那背后的思想资源与历史条件都显得相当的不足与脆弱，1992 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大分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从今天弥漫的“八十年代怀旧热”来看，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反思与检讨。

译介

猜不透的迷——我们为何阅读？

莫托克·里奇 陈丹丹 译

今年最奇幻的故事恐怕不是《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而是《与众不同的读者》。在这本艾伦·班内特的中篇小说中，英国女王忽然在晚年变得嗜书如命。

不幸的是，在这个书本与 MySpace、YouTube 和“美国偶像”进行西绪弗斯式战斗的时代，一个对文学漠不关心的人如此迅速得变为贪婪的读者，似乎有点牵强。

美国国家艺术赞助事务部（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上周公布了一条使人警醒的消息，令上述问题进一步凸显——为乐趣而阅读美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读书不多的人阅读技能也在下降，所以雇主们不断抱怨员工基本阅读理解能力不足。

这可是个坏消息。不过，难道书籍已经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了吗？还是说，人们仍会被文学的风景所吸引？而且，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人变成书虫，不断地索要更多的书籍？

这个问题不存在可由经验证明的答案。否则，很多书都会像《哈利波特》系列或者《达·芬奇密码》一样，销量惊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说，酝酿一个真正的忠实读者是个神秘的过程，不仅受制于外部力量，也为想象的火花左右。阅读量大的父母会有所帮助，但无法担保。有奉献精神老师和图书馆员也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尽管读书小组和文学博客的数量不断增长，读书从根本上说仍是个人行为。“人们为何阅读他们正在读的书是个难以知晓的，私人的事情。”萨拉·尼尔森，《出版人周刊》的总编如是说。

在某些情况下，询问人们为何阅读，就是邀请他们进行一番优雅的解释。《奥斯卡短暂的惊奇一生》的作者朱诺·迪亚兹生动地回忆起自己六岁时无意中走进一家流动图书馆的情形。他们家当时刚从多米尼加搬到新泽西州。那次，他借了理查德·史盖瑞的画册，一本十九世纪美国荒野油画集，以及删节版的阿瑟·柯南道尔《四签名》。

那么，这三本把迪亚兹变为狂热读者的书又如何呢？“我可以写个故事，解释我为何对书籍如此痴狂，”他说，“但我又感觉这么做是不可靠的。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被一种东西吸引，而不是其他呢？我觉得这是个谜”。

还是暂且不看这样的告诫吧，对于是什么使人变成持久的读者，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不同寻常的读者》摆出了这样的理论：恰当的书在恰当的时间可以引发终身的阅读习惯（对于虚构的女王而言，这本书就是南希·米特福德的《追寻爱情》）。这是许多爱书者所坚持的浪漫理想。

“这可说是起积极作用的毒品。”密尔沃基的亨利·W. 施沃兹书店总经理，丹尼尔·戈尔丁说，“如果能找到一本使人爱上阅读的书，读完之后他还会再要另一本”。

这种经历最常发生在儿时。英国记者、评论家弗朗西斯·斯布福德在《孩子与书的构筑》中写到，一条龙从“霍比特人”逐渐变透明的黑荚果中飞出，把他变为了爱书“瘾君子”。

但又是什么，使这样的一本书成为持续阅读的触发器呢？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在于发现书中人物与自己相像，或者想法、感觉和自己类似。因《兼职印第安人的完全真实日记》获得国家图书奖青年文学奖的谢尔曼·亚力克西，在领奖时感谢经典画册《雪天》的作者艾兹拉·杰克·基茨：“那是我第一次在书中见到混杂棕色、黑色、浅褐色的人物，他与我在身体上相似。而那耀眼的寂寞、灿烂的孤独又与我的精神相像。”作为在保留地长大的史伯坎印地安人，亚力克西这样对听众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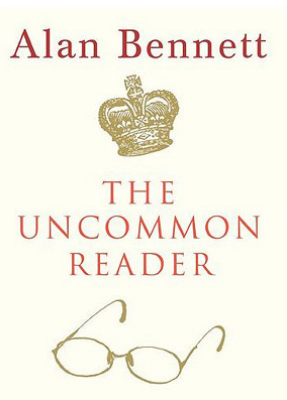
在一次采访中，亚力克西谈道，《雪天》使他由一个定期阅读的人变成真正的书籍狩猎者。“我真的认为，找到自己认同的那本书的年龄，会对剩下的阅读生涯起到决定作用，”亚力克西说，“这个年龄越小，变成严肃读者的可能性就越大。阅读实际上就是在书中寻找自己”。

当然，这并不包括为获取信息、启迪或实用性建议而进行的阅读。并且，吸引另外一些人走进阅读世界的，与其说是对作品人物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对他者的接受。正如《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作者阿萨尔·纳菲西所言的，“那种在未知世界中尝试发现的兴奋”。这本畅销回忆录记载了她在伊朗组织读书会的情形。

有时，阅读世界的大门会由一本易读的书开启。班内特说，之所以为他笔下的女王选择《追寻爱情》，是因为此书碰巧是他为乐趣而阅读的第一本成年小说。此书对于他自己，就像对于书中的女王一样，是走进更多重量级文学作品的台阶。“有很多这样的书，乍看起来像垃圾，却通往阅读的门径，”班内特坦承。

而那些引起轰动效应的书——比如《哈利波特》系列，《达芬奇密码》或者稍微低调一点的，欧普拉·温弗丽读书俱乐部中推荐的大多数书——能够通过首先把人们引进阅读中来制造习惯性读者。但通常的情况也许是，这类读者正等着下一本“热门”书呢。

确实，即使在温弗丽报出一个书名之后，该书作者其他作品的销量也未必比得上被推荐的书。“当今的读者自己不去找书，”BYR 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的约翰逊·格拉茨说，“他们总是等待着下一本推荐书。”



也许对于还有的一些人，阅读类似芭蕾舞或棒球，仅仅需要多加练习。“我想读书之于很多人就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结果到后来，他们发觉自己爱上阅读了，”青年图书馆服务协会（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的主席保拉·布雷姆·黑格说。

书籍销售总体来说仅在缓慢增长：出版同业公会，图书业研究小组的数据显示，去年图书销售总量为 31 亿册，仅比上年增长 0.5 个百分点。

阅读，特别是读书，是否必须？这一问题被如下的情况复杂化了：一些把人们吸引到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可以在别处找到，而用来消化所有这些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拉长。

有同感的读者可以在因特网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自白博客上找到共鸣。《黑道家族》、《迷失》这样的电视剧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叙事和丰满的人物形象的渴望，而这些以前只能在书中找到。

但是书籍曾经走过多次死亡低谷，也很可能继续这样走下去。“我认为自己比许多人更乐观，”迪亚兹谈到，阅读正在受难，因为书与电影、电视剧和电子产品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后者的营销预算远远超过出版商的。“缺少十亿美元宣传费的支撑”，迪亚兹说，“看看书籍今天的成绩，它们做得还不算赖啊”。

影像

论摄影（二）

书评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琥珀（一）

在历史学家（毫不令人晕眩）的目光的注视下，必然性变成了摄影不可分割的属性，卷片扳手将必然性连同胶卷一起卷进片轴，快门让幕帘升起，光穿过镜头，将一个具象的必然性显现在涂上卤化银的片基上。必然性显现的过程不像我们依据其他必然之物而做的推断那样单调乏味，不，史蒂夫说过，这过程如同“俯身向井”，给我们灵魂出窍的体验。我们从摄影（必然性的显现）中感受到灵魂出窍的晕眩。

我曾经尝试着去分解晕眩的成分。在我看来，构成摄影的晕眩与现代经验在其他领域（音乐，文学和政治活动）中产生的晕眩应该一致，它（首先）是个人投身群众狂欢（另一种必然性的显现）时的感官失控。

从照相术被发明出来到照相机变成新闻机构的标准配置，摄影制造和传播晕眩的能力有了巨大的扩张，然而，根本性的变化却是廉价的相机进入万千家庭，照片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当真正的生活死去很久之后，照片仍然作为时间的碎片（如同一块凝固了某个小生物生命痕迹的琥珀）长存下去。

观看一张发黄的 20 年前的照片，被时间的漩涡所吸引而晕眩的体验，如同农业社会中人人都有机会俯身在一口井的边沿，被幽暗的空间吸引而产生晕眩。观看照片产生的晕眩，变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经验。

晕眩的普遍性表明，观看照片产生的感官失控是一种现代潮流。我为这种晕眩的潮流而迷惑：这种潮流是现代生活的必然性的内在需求，还是被工业社会制造出来的 10000 种具有传染性的（充满偶然的）消费欲望中的一种呢？

拥塞在街上充满购物欲望的人群与充塞在街上充满革命热情的人群唯一的不同在于，后者的眼神看着同一个（必然性显灵的）方向，而前者的眼神被无数个偶然所分散。除此之外，她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消费者和革命者的感官同时在大街上体验到了失控的晕眩。

有一种照片被看成是必然性的象征，仿佛必然的幽灵经过光化学的复杂作用，亲自显影在一张相纸上面。围绕着作为必然性象征的照片，有一整套关于必然性的历史叙事。Sharbat Gula 那双令人晕眩的眼睛，因此变成了战后中亚历史（在更大的层面上，是整个冷战时期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段历史将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卷入其中，数十亿人不得不失去偶然之神的庇护。他们和 Sharbat Gula 一样，被抛掷在命运已经注定的世界上。尽管有一双令人晕眩的眼睛，却只能见证让人绝望的苦难（目的是证明某种政治制度的优劣），而不是为了接受情人的赞美和抚爱。

的确还有一种照片，它们摆脱了必然性多毛的大手的无情摆弄。摄影似乎重新发现了偶然的乐趣。我们的眼睛不是为了见证苦难，重新观察起了世俗生活中那些平淡无聊的时刻。相机从战场（1855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拍成照片的战争，因此名垂青史）回到了室内（第一张照片产生的地方），从街头（艺术史上第一个摄影师的欧仁·阿特热工作场所）延伸到了床上（曾经和现在仍在拒绝拍摄）。

摄影的历史上这一股回归世俗和偶然性的潮流，首先是技术上的。在电影《忧郁的星期天》中，德国商人向匈牙利的吉普赛女郎出示了“德意志工业的最新成就”：一台小巧便携的金属相机。向吉普赛女郎求婚遭拒后，醉醺醺的失恋者决定跳河自杀。纵身一跃之前，德国商人（应该说是导演）不忘把“最新成就”挂在桥栏上，电影给了这台（装在崭新的黄色牛皮套里的）相机（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吉普赛女郎）一个特写镜头。

这个特写镜头也许在暗示说，和古老的求爱激情及其十分偶然的结果（失恋或上床）相比，小型相机（及其制造工业）是开启新时代洞穴大门的暗号。美食、音乐、三角爱情、失恋、嫉妒和报复，甚至是战争与种族灭绝政策，都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看不到尽头），唯独小型相机的发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洞穴的大门。多年以后，苏珊·桑塔格说道：“摄影在大众中已经和跳舞、性一样普及……照相机成了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拍照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群众运动，让人晕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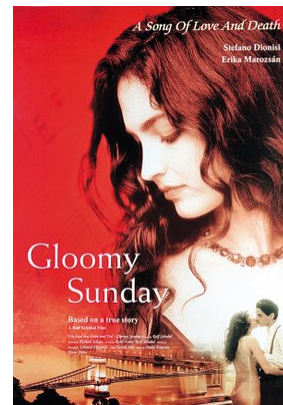
不再只是那些训练有素（和必然性一样多毛）的手打开镜头盖，或者按下快门，每一个人（首先是西方人，后来是东方人，其顺序与世界现代化的先后一致），都能拍照中得到了快乐。“怀揣着大把美金、面对巴比特式的表情的著名的五、六十年代美国游客的形象正在被日本游客的形象所替代……他们旅游时一般都武装着两台相机，一边屁股上一台。”

和从来没有见过相机的 Sharbat Gula 相比，挂在屁股（和脖子）上的相机是史蒂夫生活的一部分；和生活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中的 Sharbat Gula 相比，工业社会的时间流逝机械而迅速，不，不是流逝，而是时间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存在的只有时间的碎片及其遗迹，如同琥珀一样的照片。

然而，事情就在这里发生了变化。错过时间的沮丧愈严重（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中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自己的过去，桑塔格说），我们愈想抓住遗留下来的些许碎片。拍照因此变成了一种必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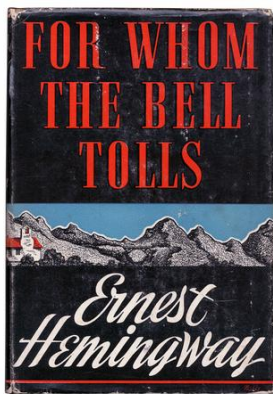
从 1950 年代到现在，桑塔格说的因为“和过去决裂”而患有精神隐疾的工业社会的游客（最狂热的摄影者永远是那些被剥夺了过去的人），一批接一批地践行她的理论（以照片诠释一切体验，使一切体验大众化）。相机从战场和街头回到了室内，甚至和我们一起上了床，然而，它没有一刻摆脱必然性的幽灵。我们将它从取景框中赶走，它又从镜头回到胶卷上。

我们投身这个必然性显影的群众运动（不管是战场上还是床上），目的都是使自己获得晕眩。在感官失控的晕眩中，时间停止了。我们不再感到被时间远远地抛在后面的焦虑。



“时间猝然停止”

摄影术产生之前，小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与时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小说家曾经普遍掌握制造晕眩来缓解焦虑的艺术。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写作于 1939 年，是业已终止的西班牙内战的产物。在海明威位于哈瓦那郊区的瞭望农场书桌前，作家匆忙草写了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大学讲师乔丹）与一群西班牙农民（首领是一个前马贩子和他的女朋友）炸桥的故事。故事发生在 1937 年 5 月的三天时间里。尽管海明威的风格极其俭省，小说却不可遏止地交代了乔丹的一生。

当乔丹和西班牙少女玛丽亚迸发出爱情的时候，小说写道，时间突然停止了：

接着是压在身子底下的石楠的气味和她脑袋底下被压弯的茎枝的粗糙感，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她紧闭眼睛上，他将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那线条优美的脖颈，仰起在石楠根茎中的头，不由自主地微微牵动的双唇和对着太阳、对着一切紧闭的眼睛上的睫毛的颤动。阳光照在她紧闭的眼睛上，使她觉得一切都是红的，橙红的，金红的，一切都是这种颜色，一切的一切，

那充塞，占有，委身，都成了这种颜色，眼花缭乱地成为一色。对他来说，那是一条不知通往哪里的黑暗通道，一次又一次地不知通往哪里，永远不知通往哪里，胳膊肘沉重地支在地上，不知通往哪里，黑暗的、永无尽头的、不知名的去处，始终

坚持着通往不知名的去处，一次又一次地永远不知通往哪里，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了，无法忍受地一直、一直、一直通往不知名的去处，突然地，灼热地，屏紧地，这不知名的去处消失了，**时间骤然停止**，他们俩一起躺在那里，**时间已经停止**，他感到地面在移动，在他们的身体下面移开去。

这次性高潮的到来不仅气势汹汹，而且将小说制造晕眩的技术特征显露无遗。时间停止了，叙事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像漩涡一样盘旋不已。

在普鲁斯特之前，小说一度如同现实中的河流，吸纳了支流，以酝酿结构上的高潮，最后它从高处跌落起来，掀起巨大的水幕，水汽弥漫，隆隆的声音让人不禁感到晕眩。

我们在《红与黑》的末尾，领教了 19 世纪小说高潮的巨大跌宕。当于连躺在断头台的下方，广场上的人群都屏住了一口气：所有的支流都已经汇入干流，叙事的水流在于连的死刑到来之前，明显加快了速度，紧张的气氛搞得人人都脸色苍白。漩涡突然从天跌落，并且在降落过程中体验到炫目的失重——时间在失重的降落中失去了方向，让人立刻陷入了幸福的晕眩。

普鲁斯特的小说却将时间消耗殆尽。时间变成了一条思绪的河流，其河床固然变化万端，却无从观察水流的变化。没有高潮，没有瀑布。《追忆似水年华》是时间的坟墓。从任何一处读起，都可以从中发现全书具有的惊人的均匀的特质。

小说变成了时间的坟墓——在幽暗的坟墓穹顶下，时间是均匀的，像空间那样可以划分成 360 个小格，首尾相衔，周而复始，不再具有前后的维度。小说艺术在 20 世纪的这一发明，摧毁了 19 世纪的艺术节奏，也将读者从进化的河流中拎出来，重新置身一条没有瀑布的河流。

在《丧钟为谁而鸣》的第三十七章中，罗伯特·乔丹和玛丽亚躺在地上，乔丹注视着手腕上的手表，目睹时间在缓慢地、几乎是难以察觉地流逝。军事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近。“他注视着分针，全神贯注地看着，竟发现简直能觉察到它在走动。”乔丹开始抚摸玛丽亚，不禁产生一种“落寞的痛楚”，“他垂下头，眼睛凑近表面，只见尖尖的夜光指针在表面的左半部朝上缓缓移动”。他开始吻她，想让时间停止；舌头停留在玛丽亚耳朵的顶端，颤抖了起来：“他感觉到这阵颤抖贯穿在那落寞的渴望之中，他看到标上的分针朝上走动，和时针构成一个小锐角，快到了点”。

她仍在沉睡。

直到“他们合而为一了”，令人恐慌的时间才停下了向前（朝上）的脚步……可贵的是现在，现在，现在。啊，现在，现在，现在，唯有现在，首先是现在，除了你这个现在，没有别的现在，而现在是你的先知。这样，尽管表上的指针仍在走动，但是这时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永远是现在。现在来吧，现在，因为除了现在只由现在。是啊，现在。现在，请吧，现在，只由现在，除了目下的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你就在这儿，我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另一个也在这儿，别问为什么，永远别问为什么，只有目下的现在；一直下去，永远是现在，请吧，永远是现在，永远是现在，因为永远只有一个现在；只由现在，只有一个，除了现在没有别的，一个，现在在进行，在升腾，在漂流，在离去，在盘旋，在翱翔，在消失，一直在消失，不停地消失。

在小说的高潮中，时间突然停止了，仿佛一条河流克服了物理定律，毫无预兆地悬浮不动；这种感受，我们即可称之为晕眩（我们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生理上的高潮（没有节制地延长一种瞬时的体验）将漫长的历史缩短为一瞬间，又实实在在地将刹那变成永恒：晕眩的这一生理基础，正是摄影的功能之一。

在艺术的历史上，推动情节来制造阅读的高潮体验，曾是一门小说家必须掌握的手艺。19 世纪后期，这门手艺达到了自己成熟的高峰，随后衰落了。晕眩不再是小说家孜孜寻求的对象。于是，摄影师从小说家手里接过了有些陈旧的火炬。

来信

“独立阅读” 2007 年 11 月校勘

言一

第 11 页：作者也给难得地加以细分
——“给”字多余。

第 11 页：一个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有力的官僚体系、国家机器内部关于产业政策有效的协调、尤其是一个权威的全能部门的存在）加上和民族资本之间形成关于工业化的共识、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国际竞争 —— 如果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允许这样的策略，并且国内劳工对于民族资本能够构成有效的钳制
——这句话难以理解。

第 15 页：在此之前几年，快七十岁的霍尔被诊断出了直肠癌，只有三分之一的存活希望，而终于击败了几次病魔的进攻活下来
——“而”字不妥。

第 16 页：而真正成为表现战后东洋市民社会特质的“关键词”，则是 1960 年代以后的事情
——“而真正”应为“而其真正”。

第 19 页：超现实般地另许多欧洲音乐的巨人
——“另”应为“令”。

第 21 页：史蒂夫中说，“看着那张面孔，
——“中”字多余。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请来信告知。